学者小品
经典

李大钊

真正的解放



羡林

学者小品经典

（第一辑）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著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民治起点	蔡元培著
人生真义	陈独秀著
真正的解放	李大钊著
容忍与自由	胡　适著
中国人的责任	邹韬奋著
湖楼小撷	俞平伯著

主　编：季羡林





李大钊

真正的解放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傅光明
编　　者：李家平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学者小品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5—4/I·218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阅读大师经典，普及精英文化

——编者的话

从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学术大师，一直到虽已耄耋之年，可仍在学苑耕耘的费孝通、季羡林、王朝闻等学界泰斗，对我们年轻后学来说，他们的功业和奉献，他们的人品和文品，都已臻至极境。他们是支撑着20世纪中国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吧，大师们的道德文章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为此，我们选择大师们的小品文作为中介，以期在学术大师和一般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能进行精神的对话和交流，力图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学术圈），为全民素质的提高聊尽绵薄之力。

那么，什么是“小品”呢？我们这里的“小品”是

个内容宽泛、边界模糊的概念，大致包括散文、杂文、随笔乃至篇幅不大，却写得轻松活泼的学术文章。我们觉得，体裁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这套《学者小品经典》不拘体裁，只要是形制短小、生动有趣的文字，都在我们称之的“小品”之列。

概而言之，本丛书所收“小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学者散文。“学者”本来各有专攻的领域，但有时也跳出专业的“小天地”来写写轻松的谓之“散文”的文字。学者散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即便是写身边烦事、花鸟虫鱼，也会旁征博引，写得别具一格。(二)学术随笔。指的是学者们在其专业范围内所写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短文。例如胡风的文艺随笔，宗白华的美学随笔，就是学术随笔的典范。这些大师级的学者用生花之笔在其专业范围之内驰骋，更是厚积薄发，左右逢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应该说，这类文章最耐读，最具可读性，常常是读者最为受益的文字。

总之，《学者小品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大手笔，小文章。这里探讨的也许是深邃的哲理，但大师们举重若轻，把看似高深的东西阐述得妇孺皆知，这正是大师手笔。读着这些朴实、亲切的文字，会在无形中丰富你的学识，提升你的品位，达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目　录

前　言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他就抱有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宏大志向，奋发学习，接收新思想。在天津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李大钊就写下了《大哀篇》等文章，成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1913年他赴日留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发表著名文章《国情》，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谬论，成为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1916年，文名大振的李大钊应邀到北京办报，他亲为报纸取名《晨钟》并担任总编辑，著有《“晨钟”之使命》一文，意欲用警世的钟声激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并针对反动军阀的言行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李大钊怀着无比喜悦

的心情在天安门前发表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随后写出《Bolshevism 的胜利》这篇光辉论文。他成为了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下名为《新纪元》的社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直到世界大同"。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积极奔走高声呐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道德、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文化教育以及有关城市、乡村的众多社会问题,广泛地教育了人民,对运动起到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他还亲自参加了散发传单、营救学生等具体的行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的实际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他是广大工人群众(当然还有农民群众和进步青年)爱戴的领袖和亲密的朋友。1927 年 4 月李大钊被捕,北方铁路工人还准备冒险劫狱,是李大钊不愿使党遭受损失,让工人兄弟再受牺牲,坚决阻止了这一行动。

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时,年仅 37 岁。他一生参加、领导了许多革命活动,还亲自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文献。本书选文,在尽量反映李大钊革命斗争足迹的前提下,也尽量从多侧面表现出李大钊作为革命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的不同风采。所以本书除文论之外,也收取了李大钊的部分诗歌、游记和随感杂文。这一考虑,也是编者私下以为,或许李大钊同志的革命先驱的形象实在丰伟,以致有人会不自觉地忽视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过人才华。当然,这种考虑很可能是浅薄可笑纯属多余,但对于本书选篇的丰富性,应该不无好处。

五峰游记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由横山往

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遍地的禾苗都很茂盛，但已觉受旱。禾苗的种类，以高粱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谷黍豆类也有。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

河里小舟漂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那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①]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还有“花会”[②]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毙。这

① “绑票”：土匪将人绑去，向他家里要钱，钱到可以把人赎回；如不如期来赎，或是钱不足额，就把被绑的人杀了，叫作“撕票”。

② 乐亭有出“花会”的风俗，系一种赌局，有三十六门。每日出两次，由三十六门中圈出一门叫作“出会”，中者一文可得三十文。各村都有叫作“跑封”的人，把押会人的封和钱送到会局；中了的封，也由他把钱从会局带来交给押会的人。收封时，会局给他抽头，押中了时，会人给他抽头。各村男女小孩都如疯似狂的押会，荒废正业，败坏风俗；常有倾家荡产的人，妇女也有因输钱过多而被迫卖淫、自尽的。

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得很，两傍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味。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1919年8月30日《新生活》第2、3两期）

游碣石山杂记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缈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

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古诗有云："而今再过经行处，树老花残僧白头。"重寄感旧之思。予以重来五峰，青山依旧，森树丛茂，不减当年，守祠人仍为前度刘郎，健干一如曩者，而同游者则易为子默，且仅一人。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乱离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也已！

五峰在昌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西历数：曰望海，曰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有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石叠起，扩其地基，敷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缈间，万树深深，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

圆通寺规模故小，明季关东边患起，蓟、榆一带，为辽东咽喉，京畿屏障，昌黎尤为榆关内之要隘。军务重镇之驻邑城者，游踪时来五峰。今昌黎祠内有二配像，复有四牌位：(一)署钦差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二)署钦命督师总率关辽兼制昌、蓟、通、保、登、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范，(三)钦差分守宣化府兵备道山西布政司参议朱，(四)署知昌黎县事蒋。心窃疑之，迨摩挲断碣，知是祠也，乃朱范等因昌黎二字而建，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故借文公为名山生色。而四氏之配享，则邑人士所建之生祠也。出祠沿西山坡南行，至挂月峰下，有一洞，石门半掩，苍苔满地，白云出入其中，额曰范公洞。有石刻像，是即祠中配享之范志完也，相传卒于山中，故邑人造像以志之。余闻之

乡先生，满清之入关也，首攻昌黎，邑人悉数入城坚守之，围七日不破。虏急于据燕京，遂西行，弃之去。全邑民命，获以保全。朱范诸人，既握兵柄，自必与于此役。然则强臣重镇，虽不能摧败强敌，捍卫疆土，而当亡国之际，尚能死守孤城，厥功亦不可没。故谓数子皆明末遗老，鼎革后隐居于此，信有由也。顾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若至事不可为，满人已僭窃中土，始相率隐避，空山歌哭，借保明室衣冠，则数子者，殆亦不失为明季之伤心人也。后之游者，得毋兴故明河山之慨乎!

范氏名志完，中州人，予于祠壁见刻其游水岩长歌一首，颇足记此山景物之一般，兹录于左：

游水岩歌(并序)

辛巳春日，予于北平谒孤竹而还，道经昌黎，瞻文公祠。次日，同郡丞冯诗吾蒋魁宇，访胜水岩，过中庵仙人台。东迤则为龙潭、瀑布泉，又东则为西五峰。层峦叠嶂，迥出尘寰。俯而视之，昌邑瀚海，较若列眉，诸峰环峙，若拱若卫，遂据此山之胜，因弄笔记之。

春朝访胜水岩边，桃柳迎风色正妍。偶延二客来翩翩，掀髯相谈意更玄。叠嶂堆里步蹁跹，行行且止共盘旋。山中老树不记年，松子森森似球圆。中峰再上半云烟，层蛮相对两峰联。老僧引路视龙潭，上有仙岩下有川。石花层层密似竿，古松斜挂如画悬。龙潭迤东瀑布泉，银碗称来不用盘。把酒峰前杯胪传，椿头菽芽味正

鲜。遥望五峰境如仙，二客乘马我腾颠，须臾相会五峰前，景色幽然别有天。诸峰错落如珠璿，三泉涓涓清且涟。松风鸟韵春管弦，石洞幽幽可参禅。昌邑城市灿如廛，瀚海汪洋列画船。登高览胜忆先贤，一僧孤立高峰颠。我欲往从解尘缘，佛骨一表法凛然。

文公案前置有枯松，枝作龙形。盖闻祠后有三泉，今仅存其东西二者，中泉正与祠宇相值，巍石壁立，有小泉突出石隙，可一尺。尤侗题壁诗云："五峰清不断，引入白云中。春后山涯雪，秋空海上风。三钩菩提井（祠后有泉三口），一尺大夫松（石线迸松，长仅尺许，寺僧云已数十年矣）。怪石排如笔，森严拱巨公。"而范氏诗中，亦有"三泉涓涓清且涟"之句，则松与泉已久供诗人吟咏之资，泉水自石罅流贯入口，浸润松根，收天然灌溉之利。厥后泉忽涸而松亦随枯，工人伐木，辄加斫成龙形，置案上，为存一故迹也。

挂月峰东南角，层峦高耸，片石突起，作龟形，故名龟石。石上有印月痕，如弓湾然，相传每岁阴历八月十五夜，月华团圞，如挂龟石上，此挂月之所由名也。

自文公祠东绕，出望海峰，下坡沿岭东走，为东五峰，山村四五家，果树环绕，不见屋瓦。山犬不惯见人，辄狺狺狂吠，逐白云出。时值秋梨正熟，与园主话片刻，竟由树摘数十枚赠焉，坚不受价，此种人惟于山陬间尚能遇之，久居都市者乌肯为此。予等坐石上濯足华，乃踉跄寻故路。途次摘采山花，兼拾松子，不知夕阳已西下岭，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

水岩寺亦碣石胜境之一，在五峰西南五里许。予与子默唱三往，古寺荒凉，了无奇迹。惟正殿阶栏有二石柱，八角菱

形，镌唐经文，摩挲久之，苔浸雨蚀，已模糊不克尽识，末署保宁元年，盖越代物也。寺东院有得月亭，每值夏季，游人麕集，地近城市，人迹甚杂，俗嚣侵染，其幽雅迥不若五峰远甚矣。

自邑城入山，东西二馒首山，犄角相持，如天然门户。东馒首山后为桃源山，旧为崔氏有。崔故昌邑望族，累代书香，名流辈出，崔子玉及其哲嗣拍振，均以能文著于时。广修文公祠记，勒碑铭壁，文字俱奇健不群，即子玉作也。录如左：

> 碣石苍苍，溟海茫茫，佳气孕灵，宜有磊落奇伟任大任者，崛起于其乡。孤竹子青风其杳如耶？相与二三同志，俯仰今古，涔涔下岘山之泪。客有指顾五峰，称道唐贤韩文公者，公家世邑乘有书。明季朱、范两公购置圆通禅院，建公祠。今春晓山贤裔，以妥神之余，大启尔宇，为谒山祠者游憩地。当夫山雨过檐，海月度岭，披云兀坐，手公遗文一编，朗诵数过，觉涛声万里，沸沸松岩间，时而壮公微言阐道，正论格君，使有唐三百年来天下，如乍闻雷霆而复见日月；时复悲公磨蝎之运，遭际屯蹇而卒，气数不易乐道之胸，谗谤益昭永世之名。不禁酹酒阶前，拜首稽首，望我公翩然来下大荒也。同治十三年春崔树宝。

斯文虽寥寥短幅，足见其胸中蕴积，有奇气，匪俗士所能道其只字。更于壁间见一绝句，题为《桃源山访崔子玉》，诗云："寂寞遥天带晚霞，云深何处是君家。渔人未识桃源路，不问樵夫问落花。"知其相与过从者，亦为一时隐逸清高之士。名山得名士足迹往还其间，草木云烟，当时亦颇不寂寞。厥后伯振亦尝设馆山中，吾友刘允之，即出其门。高躅前修，杳不可复睹，伯振闻亦于近岁以病死。桃源山松梨故宅，

近复展转以归他氏有。家山沦落，名士漂零，吾辈游人过其侧者，犹徘徊不忍去。而允之年来牢骚避世，执教鞭于碣阳成美学馆。课余之暇，时或于荒凉云树间，追寻陈迹，故山函丈，形影依稀，纵有松风泉石，亦岂足以塞允之之悲也！

桃源山今主为浙江陈氏，现在燕京，供职督府。闻以束钱四万串购得之。于梨园中构一居宅，颇幽雅。惟以移借道路，与山中人涉讼，恐不得久居此。信乎尘海深山，清浊异趣之扞格不相容也。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空山净土，为朋辈拓隐之所。斯则吾与青山之缘遇何如，且当于吾与黄金之缘遇何如卜之矣！

碣石山中，猛兽绝少，惟傍晚则有狼狐等小兽出没，曩者亦尝有虎豹藏匿其间。数十年前，樵夫尚于平斗峰上得一死豹。近以人迹日多，兽类避去，故独行深山中，了无顾忌云。

余自山中访允之，再往始遇。盖余以京友函招，须西上，且当旋里一行，故匆匆立谈片刻，仅为子默介绍，恐其独处山中嫌寂寞也。迨自家返昌黎，复与子默、允之等入山一次，居成美学馆二日，备受杜瀛州夫妇之优遇。宗教家之诚恳与世，其爱綦宏感且不绝于余之心矣。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不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山中十日，游兴未尽。其中庵龙潭瀑布泉、仙人顶、石佛洞等处，则期以后日焉。

（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6期）

大 哀 篇

（哀吾民之失所也）

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口谤腹诽，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以暴易暴，传袭至今。噫嘻！悲哉！此君祸也，吾言之有余痛矣。然自满清之季，仁人义士，痛吾民之颠顸于异族专制之下，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言之者瘏口哓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镌心，志兹硕德，亦欣欣以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

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归而犹绐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抑吾闻之，各党之支分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夫此踞要津享大名者，充其极不过一总统，一都督耳，否则两袖清风之空衔伟人耳，既无邓氏之铜山，更乏郭家之金穴，顾安得此钜金者，其故不大可思乎？或谓予殆不知政党之作用，故讥之无完肤。曰：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禾、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其抗中央也，则曰：“吾拥护民权也。”其胁人民也，则曰：

“吾尊重国法也。”究之，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复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嗟呼！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竟若是矣！吾民更奚与共安乐者，耗矣。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重以库帑空虚，岁出增巨，借款未成，司农仰屋，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民既托庇于其下，在理当负斯责，亿辛万苦，其又何辞。然求于民者民应之矣，民之切望于国家者，乃适得其反。呜呼！吾民乃委无望矣。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试观吾国，版图若兹其阔，民庶若兹其繁，江河贯于南北，沃野千里，天府之区也。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而锋镝扰攘之余，为之国家者，不有以解其倒悬，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血，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呜呼！国家至此而劳于用，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果何为乎？然是岂国家自身之咎哉？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

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兀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

（1913年4月1日《言治》第1期　署名：李钊）

国　情

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同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扞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况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则其标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赖。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

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二氏学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幸而与谋国情者仅一美人一

日人耳，而新约法之毛颜已斑杂二种。设更得黄金百万，开馆筑台，延纳列国博士，相与辩析天口，文擅雕龙，抵掌而论吾国情，时势潮流之所推移，群众狂暴之所酿煽，一人意志之所专恣，所能容与斟酌于国情者之量几何？将亦为天下挟策干时之士裂矣。夫非筑室道谋之类乎？

往者有贺氏倡为总统内阁制之说，以迎当道，而宪法之风潮以起，吾侪已惊其立言之异趣矣。而新约法颂布之顷，古德诺氏复有“新约法论”刊于北京各报，所论是否谐理，姑不置辩，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余地，独其所谓国情者，不能无疑焉。

氏之论国情也，要谓吾民俗重视家族，淡于政治，自昔无选举制度，似谓国情如此，行代议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尝思之，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基，于以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以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尚纯以放任为治，征赋折狱而外，人民几与国家无涉，国权之及于民也轻，故民意之向于政治也淡。然历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罚、薄税敛为戒，其民始相安于无事，否则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国大陆之中，闭关自守，历有年所，初无外力之激迫感动，而家族制度之巩固，亦足以远却国家之权力，故此状保持独久，民情亦因之稍异，斯诚近似。而今则何如者？近世国家政务日繁，财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负担之重，已非昔比。于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声愈高，而争获参政之柄者，亦不惜牺牲身命以求之。稽近世政变之由来，直可谓为因赋税之加重而起也。中国海通而后，亦竞立于列国之林，财政用途之扩张，不惟不能独异，而以屡逢创挫，国力益微，养兵赔款，穷索编氓，维新以来，负担益重。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

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阙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苟能返吾民于上古榛芒之域："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者！"虽无国家可也。即不然，取于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赋敛不如今之重，使民不闻政犹可也。奈世无兹大力者堪与时势抗耳。抑氏不云乎："官吏诛求过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对于政治之权力，舍此固无他术也。"夫然，当此负担加重之时，吾侪乃谋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议政治行于吾国，以免于祸乱，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

氏论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习于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从命令与夫反抗苛虐之积习，一旦改数千年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欲其晏然无事，苟非其政府有维持秩序之能力，盖必不可得之数矣"。吾之国民生计，日濒艰窘，无可掩讳，然遽谓其至于无参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盖所谓生计艰者，比较之辞，非绝对之语，较之欧美，诚得云然，较之日本，尚称富裕，胡以日人有参政能力，而我独无也？此则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国民之精神，不外服从法令与反抗苛虐二者。盖共和国之所由建造，大抵为反抗苛虐之结果，而其所以能安于共和政治之下者，则必有服从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为吾之国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国无间东西，政无分共和、专制，政府要宜具有维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国既不能独异，亦非特因吾之

国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于国情过笃，竟忘其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

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 Republic 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厉之事相告，则论共和先例者，当更添一奇观矣。伤时之士，见有贺氏议论，怦然心动，至谓以地势相连，遂成今果，无善法以弥此憾，惟深望识时之彦，常往来欧美。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　署名：李大钊）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人已汲新泉，尝新炊，而我犹卧榻横陈，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沉鼾于睡眠中华、黄粱酣梦之里也。

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人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奋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飈飈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坟墓中之中华，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而拱手以让之老辈，俾携以俱去。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老辈之于社会，自其长于年龄、富于经验之点，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即令以此自重，而轻蔑吾青年，嘲骂吾青年，诽谤吾青年，凌辱吾青

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无所于踌躇，无所于逊谢。须知吾青年之生，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今日中华之青年，犹是崇拜老辈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则其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举一国之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郁其灵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头阔步，以陟于社会枢要之地，据为首丘终老之所，而欲其国不为待亡之国，其族不为濒死之族，乌可得耶？吾尝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与老辈宣战，不能与老辈格斗。盖彼老辈之半体，已埋

没于黄土一坯之中，更安有如许之精神气力，与青年交绥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乐引为良师益友，不敢侪之于一般老辈之列，而葬于荒冢之中矣。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此则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不能不需“晨钟”之愤发与努力者矣。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于当世，亦皆在破坏者、怀疑主义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萨兰德、海尔特尔、泠新、乃至改得西尔列尔之流，其于当代，因亦尝见诋为异端，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彼其破丹败奥，摧法征俄，风靡巴尔干半岛与海王国。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所谓“青年德意志”运动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为中心，而德国国民绝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麦、摩尔托克、维廉一世而起，于其国民之精神，与以痛烈之激刺。当是时，海聂、古秋阔、交巴古、门

德、洛北诸子，实为其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居今穷其因果，虽欲不归功于青年德意志之运动，青年文艺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土尔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顷者，则青年土尔其党愤起之功也。印度民间革命之烽烟，直迷漫于西马拉亚山之巅者，则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

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署名：守常）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

欧洲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此欧人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欧人不避此辛苦，勇往奋进以赴之者，则欧人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西南义师之兴，呜咽叱咤，慷慨悲歌，此民国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吾民不避此辛苦，断头流血以从之者，则亦吾民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晨钟》创刊，缔造经营，竭尽棉薄，犹虑弗胜，此本报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本报不敢辞其辛苦，殚精瘁力以成之者，则亦本报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夫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吾人日循此轮回生死、成

毁、衰亡、诞孕之中，即日尝辛苦，日需努力，而不容有所怠荒。“晨钟”之所以警世，与其所以自勉者在斯耳。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 署名:守常)

青　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人事万端，那堪回首，或则幽闺善怨，或则骚客工愁。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

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霁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韶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其有尽，纵有彭、聃之寿，甚且与宇宙齐，亦奚能许我以常享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无尽之宇宙竞进，又何不能之有？而宇宙之果否为无尽，当问宇宙之有无初终。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庄周有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云："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

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通，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造物与吾皆无尽藏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

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遽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彗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冈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及毁。天地且有时而毁，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惟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此实未答之问也。苟犹在儿童或青年之期，前途自足乐观，游优乐土，来日方长，人生趣味益以浓厚，神志益以飞舞；即在丁壮之年，亦属元神盛涌，血气畅发之期，奋志前行，亦当勿懈；独至地球之寿，已臻白发之颓龄，则栖息其上之吾人，夜夜仰见死气沉沉之月球，徒借曜灵之末光，以示伤心之颜色于人寰，若以警告地球之终有死期也者，言念及此，能勿愀然。虽然，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

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

复次，生于地球上之人类，其犹在青春乎，抑已臻白首乎？将来衰亡之顷，究与地球同时自然死灭乎，抑因地球温度激变，突与动植物共死灭乎？其或先兹事变，如个人若民族之死灭乎？斯亦难决之题也。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自妇人畏葸，抱子而奔，始学立行，胸部暴露，必须被物以求遮卫，而人类遂有衣裳；又以播迁转徙，所携食物，易于腐败，而人类遂有火食。有衣裳而人类失其毛发矣，有火食而人类失其胃肠矣。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遐，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关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响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恶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布兹骇世听闻之噩耗，而冀以谋挽救之方也。宗教信士则从而反之，谓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如生物家言，是为蔑夷神之功德，影响所及，将驱人类入于悲观之途，圣智且尚无灵，人工又胡能阙，惟有瞑心自放，居于下流，荒亡日久，将为人心世道之忧矣。末俗浇漓，未始非为此说者阶之厉也。吾人宜坚信上帝有全知全能，虔心奉祷，罪患如山，亦能免矣。由前之说，固易流于悲观，而其足以警觉世人，俾知谋矫正背乎自然之生活，此其所长也。由

后之说，虽足以坚人信仰之力，俾其灵魂得优游于永生之天国，而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乃其所短也。吾人于此，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于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𣿰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祇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和兰，若比利时，若丹马，若瑞典，若挪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其校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

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响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眦,怒其侮我之甚也。虽然,勿怒也。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巴尔干诸邦,则各谋离土自立,而为民族之运动,兵连祸结,干戈频兴,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遥望喜马拉亚山之巅,恍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澒洞,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建国伊始,肇锡

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中以后之历史，则以是为古代史之职，而别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更生回春为其中心之的也。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竟如是废落，终竟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

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抑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昔时繁华之盛，荒凉废落至于此极也！毋亦无此种草木为之文柔和润之耳。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畴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豪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石火，不可淹留，浮生若梦，直菌鹤马蜩之过乎前耳。是以川上尼父，有逝者如斯之嗟，湘水灵均，兴春秋代序之感。其他风骚雅士，或秉烛夜游；勤事劳人，或重惜分寸。而一代帝王，一时豪富，当其垂暮之年，绝诀之际，贪恋幸福，不忍离舍，每为咨嗟太息，尽其权力黄金之用，无能永一瞬之天年，而重留遗憾于长生之无术焉。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永叹，空有“欢乐极矣哀情多，少壮几时老奈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敬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然是又安可得哉？夫人之生也有限，其欲也无穷，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红颜难再，白发空悲，其殆人之无奈天何者欤！涉念及此，灰肠断气，厌

世之思,油然而生。贤者仁智俱穷,不肖者流连忘返,而人生之蕲向荒矣,是又岂青年之所宜出哉?人生兹世,更无一刹那不在青春,为其居无尽青春之一部,为无尽青春之过程也。顾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岂惟无处购买,邓氏铜山,郭家金穴,愈有以障翳青春之路俾无由达于其境也。罗马亚布达尔曼帝,位在皇极,富有四海,不可谓不尊矣,临终语其近侍,谓四十年间,真感愉快者,仅有三日。权力之不足福人,以视黄金,又无差等。而以四十年之青春,娱心不过三日,悼心悔憾,宁有穷耶?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昔者圣叹作诗,有"何处谁人玉笛声"之句。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圣叹则曰:"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是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诗人拜轮,放浪不羁,时不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轮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来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遣,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校,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轮此言,固甚矫激,且寓风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

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耶比古达士曰："贫不足恐，流窜不足恐，囹圄不足恐，最可恐者，恐怖其物也。"美之政雄罗斯福氏，解政之后，游猎荒山，奋其铁腕，以与虎豹熊罴相搏战。一日猎白熊，险遭吞噬，自传其事，谓为不以恐怖误其稍纵即逝之机之效，始获免焉。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大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豪末。而今日之我，则因是而大损其气力，俾不足以御明日之祸而与之抗也。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耶经有云："富人之欲入天国，犹之骆驼欲潜身于针孔。"此以喻重荷之与青春不并存也。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

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罣，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蕲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骘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君曰："彼其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署名：李大钊）

孔子与宪法

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吾今以此标题，宁非怪诞之尤。然于怪诞标题之前，久已有怪诞事实之发见。本报之功用，颇重写实。此怪诞之标题，盖因怪诞之事实而生也，岂得已哉？

怪诞之事实者，何也？则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事是也。云何以此为怪诞？最宜以孔子与宪法为物之性质两相比证，则知以怪诞之名加之者，为不妄矣。

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

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此孔子之纪念碑也。此孔子之墓志铭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无问其信仰之为佛为耶,无问其种族之为蒙为回,所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也。以一部分人尊崇之圣人,入于全国所托命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一部分人之宪法,非国民全体之宪法也;所谓孔教徒之宪法,非汉、满、蒙、藏、回、释、道、耶诸族诸教共同遵守之宪法也;乃一小社会之宪法,非一国家之宪法也。此挑动教争之呼声也。此离析蒙藏之口令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宪法者,一文一字均有极确之意义,极强之效力者也。今以含混无界之辞,入于辞严力强之宪法,无论实施之效力,不克普及于全国,即此小部分之人,将欲遵此条文,亦苦于无确切之域以资循守。何者为孔子之道?何者为非孔子之道?必如何始为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必如何则否?此质之主张规定此条之议宪诸君,亦将瞠目而莫知所应。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然则辛苦经营,绞诸公数月之脑血,耗国家数月之金钱以从

事于制定宪法之劳者，不几为无意义乎？

总之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吾人甚希望于二读会时，删去此项，以全宪法之效力。此一部尊崇孔子之人，尽可听其自由以事传播。国家并无法律以禁止之，社会并可另设方法以奖助之，何必定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子壮其声势，俾他种宗教、他种学派不得其相当之分于宪法而后快于心欤？

（1917年1月30日《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余既绝对排斥以孔道规定于宪法之主张，乃更进而略述自然的伦理观，以判孔子于中国今日之社会，其价值果何若者。

吾人生于今日之知识世界，唯一自然之真理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历稽中国、印度，乃至欧洲之自古传来之种种教宗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极，曰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指此大主宰而言也。由吾人观之，其中虽不无一二叶于学理的解释，而其或本宗教之权威，或立理想之人格，信为伦理之渊源而超乎自然之上，厥说盖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

也。

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其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

余谓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而自然的势力之演进，断非吾人推崇孔子之诚心所能抗，使今日返而为孔子之时代之社会也。而孔子又一死而不可使之复生于今日，以应乎今日之社会而变易其说也。则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

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盖尝论之，道德者利便于一社会生存之习惯风俗也。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代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

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俄国大革命之酝酿，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远因近因纷综累积，卒以演成今兹壮快淋漓之活剧，余既于本报略述其梗概矣。惟其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兹复约举其说，贡览观焉。

一、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　欧战勃发以来，颇闻世之论客，有谓十九世纪之初，以全欧之人战一拿破仑，拿翁败而"唯民主义"从而大昌；二十世纪之初，以全世之人敌一维廉二世，维帝胜而"新英雄主义"必从而崛起。于是热心官僚政治之徒，闻其说而和之，不曰"哲人政治"，辄曰"贤人政治"。吾之东邻，寺内内阁之成立，即以是为招帜者也。其国之学士文人，如上杉、慎吉、茅原、华山辈，又从而为之鼓吹。吾国论坛，拾人唾余，亦欲以贡之吾民，是皆官僚政治之梦想，开明专制之变相，非予以当头之棒喝，俾为痛切之警

悟，此种谬误之思想，蔓延于政治，终于酿成反动之祸根。兹幸于战端未息之时，俄国革命之风云，即蓬勃于欧、亚连毗之域界，德国国民亦因之生绝大之觉悟。夫俄与德固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绝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可以推知。盖前世纪之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贤人政治"者其猛醒！

二、及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　吾国改建共和以来，国中犹有一部分人，对于共和政治深抱疑虑，此无须讳言者也。虽一再革命，国民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而此辈顽迷，终难使之觉悟。迩来复辟运动之说，虽属无根，然使国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倾于"官僚政治"之趋势，则此剪除未净之谬种，难保不附之以复萌。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可不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撄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此因果之定律，报偿之原则，循环往复，若兹其巧，或即异日中、俄两国邦交日笃之机缘欤？

（1917年3月29日《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战争与人口问题

余曩居日本，时闻彼邦政界山斗，奋勖其国人者，辄提二义以相警惕。彼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内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根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

余之举此，以证今世列国对于战争之观念，其的志乃在赖以解决己国之人口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roudhon 氏“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

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

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余乃审马氏之说而妄为之评骘焉。马氏人口论之要旨，在谓地球之面积有限，地之生产力又为报酬递减之法则所制，而有一定之限度不能超越，故食物增加之率为算术的，而人口增殖之率则为几何的。人类苟不自节其欲以限制其出生，纵其本能之所之，必陷于人口过庶之境，而饥馑灾病夭折之祸殃，战争掠夺自杀杀人堕胎等之罪恶，乃以不免。人欲避是等祸殃与罪恶，当以节欲洁身之德，自度其生计之能力，而后娶妻生子，此患或可减免，舍此更无他道。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由今考之，各国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征之英、法、美诸邦之统计，皆有此等倾向，此其说之不完者一。就令果过庶焉，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之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初非必待节欲始克遏其势者。又况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究能奏效与否，尚为一疑问，此其说之不完者二。准此以谈，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必绝对不可抗者，盖所谓文明即人类发挥其天赋之能以与自然势力抗敌之度也。人类本能之势力日增，自然之势力日减，即文明之程度益进。今世之声、光、电、汽，无非人类依其开发之资能，战胜自然势力之虏获品。使无文明之进步，则声之不能传，光之不能显，电汽之不能应用以缩小时间与空间，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顾以人类思究之精，发明之巧，飞机可回旋于空碧，潜艇可横行于海底，汽车、汽船可以较少之时日绕遍坤舆一周，无线电可以瞬息之刹那坏星球数度，而一一战胜自然以有若是之成功，安见地力之所包蓄者，尽于今日人智所

能发见之度而不可以文明之势力抗之欤?此其说之不完三。马氏既认定人口过庶为确定之事实,复认定报酬递减为无抗之法则,遂谓微人各准其生计之度,以自行节欲、限制出生,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一方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暗示人类以战争之难免,乃以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人生之祸烈矣。此其说之不完四。有此四者,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今而犹不揭出救济人口过庶之正当途径,与夫人类好战之真实原因,长此相杀,以争自存,余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几耶?

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斯而不除,即使举世之人,其生活程度一跃而皆能伍于欧美中等以上之社会,争城争地之事,亦岂能尽免者。吾人果以人口过庶为忧,亦当知人口所以过庶者,必为其群贪惰自弃之结果。欲有以救之,惟在祓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消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最后当附一言者,余虽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稍存贪惰之心,必来穷乏之患,而以无敢邻于怠荒焉。余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余谓此事之当然,与其著眼于经济,毋宁立脚于伦理,盖恐使人误认解决人口问题之

道，舍此更无他术，因而自忘创造文明之努力，自疑消弭战争之可能。此则余作本文之微意也矣。

（1917年3月30日《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真理之权威

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酥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时贤多以为与目今之社会不相应，颇以为过。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券首发端，即陈此义曰："……今日学术社会之不发达，与思想界之窒塞、腐败所由致之使然，其责读者固应分之，即著者亦乌能辞其咎。浅演之群，其智不足与语高深，譬执今之人而劝之，宁崇拜真理，勿崇拜孔子，必将哗然群詈，訾为大逆。虽有至理，其不能以入焉，固也。然彼之不知崇拜真理固愚，而我曰，汝勿崇拜孔子，亦过喻之理而挑之怒，将求我信，宜乎其难。……似为针砭余言而发者也。余既拜赐良友药石之箴，复喜余崇拜真理之主张，实已得吾友之同

情，又进而以其委婉曲谅之言，辗转以渐入社会之心趣，而潜消其訑訑固拒之程，益信真理之权威，不以流俗社会之未喻，而有所损削。余此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用益壮矣。

言论之挟有真理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故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子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

然而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即令各人竭其所知，以求真理之所在，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此其为道，不几一分而不可复合，一乱而不可复理，将言真理者愈众，求真理者愈多，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湮没而不彰乎？曰，此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也。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达之境，达于其境而确将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人所见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

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堕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而葬于幽暗之域，乃为死亡之特征。然则吾人苟有所自信，初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抑斥为邪说淫辞。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使人人皆慑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而苟且姑息，以与之因循敷衍，不惜枉其所信以暂屈于现状维持之下者，亦觉于真理之生涯未能彻底。平情论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此立宪政治之所以重乎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乎自由也。虽其立言之旨，不容于当世，要其助益进步之功，亦与渐世之言论为用相等，或且过之。方其一群之中，犹自封于前人先圣之说，骤闻之，或且訾为离经畔道之徒，而于其说乃扞格而不相入。究之自有此离经畔道之说，一于世人之思想，着其痕影，虽受之者期期以为不可，而由斯已得正负相反之意象，并列杂陈，以于不知不识之间，动其坚固不拔之单纯思能，彼纵始终对于斯说，深恶痛绝，而有较为和缓委曲之说，以向之陈说，斯其言之虽不得直接以承其信许者，而间接以收调剂之功，已为不少。即让步言之，此种骇世之言论，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亦不足以沮立言者之气，而遂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此其事，古人有行之者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

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李卓吾氏究讨内典，得罪儒宗，举世儒生，尽情谤僇，几不侪于人类之伦，卒至囚其人，火其书，然而卓吾当日，固明知其书必遭焚毁之阨，而犹自榜其书日，"焚书"，将其所信，表而出之，而今其书固犹流在人间也。苏格拉的当其身，尝以慢神不道之罪，而受国人之众推廷鞫，终以受戮矣；耶稣基督，亦以逆天之罪受时人之磔杀，流血于十字架上矣；近代俄之大儒托尔斯泰氏，亦尝见嫉于政府，破门于宗教矣。然而今世之人，或则崇为哲家，或则尊为教主，或则称为旷代文豪，此以知言论之权威，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1917年4月17日《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此　日

（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

光阴荏苒，民国建立，忽忽六年，今日又为民国六年之国庆日矣。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飘飘国徽，翻扬空碧，其与吾人以绝强之印触者，诚不知是悲是喜！但一回溯此六年中，风尘澒洞，戎马仓皇，此万众欢呼之国庆日，殆皆于风鹤中度之。吾民丁兹新旧嬗更之交，喘息未安，惊魂又丧，流离转徙，思痛抑且未遑，庸能忭欣鼓舞从容逸乐以为庆祝。此以知新命诞生之难，而国民所以为之努力者，益不容稍息也矣。

仆尝论之，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而能忍此苦痛以赴之者，为足尽诞生新命创造新运之努力。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

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凡其国民所不敢避之苦痛，即其国民所不容委之努力也。向使三国之民，畏难苟安，避苦痛而自弃其当尽之努力，则自由之惠与虽丰，恐不及于三国之民也。

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恐焉。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此则国庆日者，乃新中华诞孕之纪念日，非新中华长成之纪念日；乃吾民开始努力之纪念日，非吾民太平歌舞之纪念日；乃吾民勇于牺牲之足庆，非吾民臻于安乐之足庆也。

年来国事之坏，造因固自多种，而最足痛心者，乃为党争一事。其在平时，各党人士之立言，多属一偏之辞，绝少同情之论。独于今日，乃罔不以奋斗拥护共和自矢，仿佛良知所诏，惟于此日，恩怨都消，各愿以其真实诚挚之天良，质诸神明，贡之国家。夫人非圣贤，岂能无过，惟善修养者，每于昧爽平旦之际，深自省察，故能复其明德。大局至斯，平心论之，亦岂一党一派之过。但望各派人士，皆以此日为一年中复旦之机，痛自忏悔，则往者已矣，未来之事，待各派人士之猛省以图补救者，尚自多端。国人苟犹有悔祸之心，请即以今日为洗心忏悔之日可矣。

昔者，德人蓄战英之志，尝胆卧薪，举国皆是，军士于杯酒酬酢之间，相与谈及，辄以“此日”(The Day)一语代之。仆今亦愿持此语赠吾国民，斯非必如德人之指与某国交战之日，亦谓由此亿万斯年，年年都有“此日”，等闲过之，宁复有何意味，即或唏嘘凭吊，徒回顾过去以为可歌可哭之节令，而忘却未来活跃精进之生涯，亦岂兴国之民所应出者。窃以

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宜自今日起，至翌年此日，划为一期间，来年以下，亦复如是，而皆定其应做之事业，立其应达之目的。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疆之休，将以此日为发轫之始矣。

抑吾尤有感者，黄花岗畔，汉水潮中，先烈之殉共和以死者，固不知其几千万辈。此日招魂望祭，国家之所以崇报忠良，宜如何庄重其典礼，厚恤其遗族；而今酬勋授位，乃厚生而薄死，国庆之日，文虎嘉禾，勋章雨下，甚且洪宪帝孽，造反罪魁，咸膺上赏，独不闻于殉国先烈之丘墓、遗族有所瞻顾。在死者一瞑不顾，生前已为其国尽最终之努力以去，英灵在天，尚复何憾，区区后人之荣封祀祷，奚足以慰死者于九京，然而国家社会，薄待英雄至于若此，吾人坐食先烈之赐，诚于心有弗安者矣。

嗟夫！国有英贤，不幸而生于嫉贤妒能之社会，于其生前，既饱受世之诋毁排挤，而悲愤抑郁以殒厥身，因与兹世生死辞矣。今以其人之既死，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与生者之名誉地位无所妨害，始肯稍事敷衍，而此嫉贤妒能之心理，犹不能从死者以葬于坟墓之中，转而移注于其他未死之辈，风俗人心之坏，是则堪为痛哭者也。

偶有所感，以稔足下，非志庆之辞，乃伤心之语也。余不白。

国庆日 L. S. C. 生白

(1917 年 10 月 15 日《太平洋》第 1 卷第 7 号　署名：L. S. C. 生)

“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什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什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

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署名：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

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　署名：守常）

Bolshevism 的胜利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

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哪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军、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 Hohenzollern 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乘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

(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哪一国哪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哪一边的武力把哪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国 Bolsheviki 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在东欧是 Bolshevika 的话,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 看破

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 Czar 的战争，是 Kaiser 的战争，是 Kings 的战争，是 Emperors 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点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 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 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我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

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像 Bolshevism 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但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

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官僚咧,军阀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

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eh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 年 10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　署名：李大钊)

新　纪　元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像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

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不大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

民也没有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的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工人的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

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作于1919年元旦。

(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

政　客

主客是对待的名辞，既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哪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

（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署名：明明）

过激乎？过惰乎

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Inertia)。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步的力量大的多。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其实世间只有过惰，哪有过激！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署名：明明)

乡愿与大盗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署名：明明)

放弃特殊地位

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真是明白话。这特殊地位，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德国要想在世界上得一个特殊地位，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争。资本家、地主要想在产业界占特殊地位，惹起了社会革命。中国有一派人要想在中国保持特殊地位，惹起了南北纷争。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

(1919 年 1 月 26 日《每周评论》第 6 号　署名:明明)

青年与农村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俄国今日的情形,纵然纷乱到什么地步,他们这回革命,总算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总算是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我们要晓得,这种新机的酝酿,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

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

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哪个？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贼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那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

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从前的村落都有个寺院庙堂,他们也不会利用这些东西,作他们大家聚合的会堂,白白的看着他颓零在荒烟蔓草的田里。村落中也有比较开明一点,大家立个青苗会,在庙堂中觅个会所,也不过听那些会头们、绅董们一手处理,有了费用,就向老百姓们要;用去以后,全没什么报销。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哪个的责任?

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入民国,名义上也算行过几次选举,可是弄得污七八糟,几乎把这个制度糟蹋的没有一点本来面目了。根本的原因,就在农村中没有真的农民伴侣的青年,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那些运动选举的人都是来自都市,不是在都市中当过几天流氓,就是在都市中作过几天强盗,练习了许多的诡诈手段,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却来

骗他乡里的父老。这些人都靠着选举入了议院。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那些老百姓的生活上的疾苦哪能改善？生活上的幸福，哪能获享？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们，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每人投的清清楚楚的一票，必能集中到一个勤苦工作、满腹和劳工阶级表同情的人身上。他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他的话才能有无限的权威；万一有种非礼的压迫无端相加，老百姓才能作他们的后援。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

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哪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

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尚有一个疑问。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1919年2月20日—23日《晨报》 署名：李大钊)

新旧思潮之激战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我们且看今日的日本，新的方面，有"黎明会"一班人士种种的结合，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

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他们虽然定了一个公同进行的方向，都向着黎明的曙光去走。可是各人取哪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那反对一方面，也是堂堂鼓、正正旗来相对应。“桐花会”这一般人的思想虽旧，他们也知道本着自己所信的道理、思想，和新的对抗。就是那个“浪人会”的行动，在日本社会已为舆论所不直，他们对于新派的激战，也不过开一个演说会，请反对党的魁领莅会辩论而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精彩，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

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哪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署名:守常)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之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

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凋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哪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中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们实在乐得过,不是忍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哪个苦,哪个乐,全靠个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

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子，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人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

么痛苦了么,你为何又说要我们青年在痛苦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向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信你心的清白与自然,哪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

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者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1919 年 3 月 14—16 日《晨报》 署名:守常)

强国主义

大战终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种名辞，都随着德意志的军阀丧失了他的运命。我们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者，又来讲什么“强国主义”。这个东西，恐怕又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又是破坏世界平和的种子！

(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　署名:明明)

现在与将来

近来常听人说:“中国人所以堕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他们只有‘现在主义’靡有‘将来观念’”。因此,就拿“时间只有过去与将来,绝靡有现在”的话,来劝告他们。也是希望他们抛了“现在主义”,存点“将来观念”的意思。但是我对于这话,却有几个疑问:(一)堕落的生活中的现在,在人生观果然算得现在么?(二)就他们的生活而论,果然靡有他们的将来观念么?(三)时间果然靡有现在么?我要就这几点说几句话。

现今一般堕落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所以从人生上讲,他们不但靡有将来,并且靡有现在。他们的现在,不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发舒兽欲的机会。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搬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

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像这样的活动，在宇宙自然的大生命中，在人类全体的大生命中，在他自己一个人的全生命中，有丝毫算得是人生的现在么？依我看来，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他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这种的生活，不配叫什么主义。

这种堕落的生活，固然在真正人生上，不但靡有将来，并靡有现在；而在他们的兽欲生活中，都是不但有他们的现在，并且有他们的将来。试看那强盗军阀，哪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扣侵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那卖国官吏，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至少也可以做下半世的过活？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是总想作回大官，发回大财，又哪个不是为他将来的物质生活作预备呢？这样看来，他们虽然靡有真正人生的将来，他们却有他们那种生活的将来。他们固然有他们那种生活的现在，却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

至于时间是否有现在，是哲学上一大问题。有人说只有过去与未来，靡有现在，有人说过去与未来都是现在。如今我们且不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但是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拆，不可断灭。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完成这自然的大生命，应该先实现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想

实现自己的人生，应该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不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

（1919年3月28日《晨报》 署名：守常）

混充牌号

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王麻子的刀剪好用，什么王麻子、旺麻子、真正麻子、老王麻子，闹个不清。稻香村东西好吃，什么稻香春、新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闹个不清。茶庄有王正大、汪正大的混杂，也是这个道理。“民本主义”的话，在日本很流行，什么民本的军国主义、君主民本主义，闹个不清。卖药的广告，也说“民本主义”。“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这都是“混充牌号”。

（1919 年 4 月 6 日《每周评论》第 16 号　署名：常）

宰猪场式的政治

日本人说他们的政治，是动物园式的政治，把人民用铁栅栏牢牢的关住，给他们一片肉吃，说是什么"温情主义"。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

(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第18号　署名：常)

废娼问题

废娼运动，是现代社会运动的一种。最近上海有一部分外人提起这个问题，某报因此特辟一栏，征求社会上对于妇人问题的意见，登了好久，并没有一个应声的人。可见中国人一般的心理，都不认妇女有个人格。这真是可怜的现象！

我们主张废娼，有五大理由：

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　凡是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作仇敌，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攻讨他，征伐他，非至扑灭他不止。到了今日，人类社会上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他放在娼门里，让他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拥有金钱的人的

欢心，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的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一种可怜、凄惨的光景，恐怕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至于娼寮中的黑暗，和他们在那里所受的虐待，真是人间的活地狱一般了。像这样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事，若不绝对禁止，还讲什么人道自由，不是自欺欺人么？

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致令一般人对于恋爱起一种苟且轻蔑的心，不在人生上求他，却向兽欲里求他，不但是侮辱了人权，而且是侮辱了人生。

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 认许公娼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娼妓既然不能废止，对于花柳病的传染，就该有一种防范的办法，那么与其听他们暗自流行，不如公然认许他们，把他们放在国家监视的底下，比较的还可以行检查身体的制度和相当的卫生设施。可是人类的生活，不只是肉欲一面，肉欲以外，还有灵性。娼妓不能废止的话，实在是毫无根据。且据东西的医生考证起来，这种检霉法实是没有效果。因为检霉的人，每多草率不周，检霉的方法又不完备，并且不行于和娼妓相接的男子，结果仍是传染流行，不能制止。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又据医家说，久于为娼的女子，往往发生变性的征候，这个问题，尤与人种的存亡，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 公娼制

度，与人身卖买制度全是一样。娼寮中的妓女，大半是由卖买来的。从前各国因为废奴问题起过战争、革命的都有。如今国家反来认许公娼。须知认许公娼即是认许人身卖买，也就是认许破坏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实行民治的国家，绝不许有这种恶制存在。因此联想到买妾买婢的风俗，也算是一种娼妓，也应该和娼妓一齐废止。

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 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第一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点痕迹。我很盼望中国主持正义的男子和那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大运动，不令社会上再有娼妓妾婢这等名辞存在，不令社会上再有为人作娼、作妾、作婢的妇女，不令社会上再有拿人作娼、作妾、作婢的男子。

我的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其实这都还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1919年4月27日《每周评论》第19号 署名：常)

“五一节”May Day 杂感

一年一个五月一日。何以叫做“五一节”?“五一节”从什么时候有的?自从一千八百九十年有的;自从一千八百九十年以后,年年都有一回“五一节”。

一千八百九十年的五月一日是什么日子?那一日是什么人有什么举动,才把这日作成了一个“五一节”?那个日子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告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

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世界的同胞们都有一定的仪式过这个祝典么?那种仪

式情形,年年处处都是一样么?不一样,决不一样。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 Karl Marx 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1919 年 5 月 1 日《晨报》 署名:守常)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哪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

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玛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的移民史,哪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

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般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觉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署名：常)

太上政府

呵！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署名：常）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像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嗳

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此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

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署名:常)

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最危险的东西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他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

(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我与世界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真正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万恶之原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哪里有丝毫的亲义！

(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

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

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

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署名：李大钊）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

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

我们要是长久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恐怕要死；就是不死，也没有什么生趣。我们急切的很要求一种新生活。

新生活的创造，一半由于政治的设备，一半由于社会的设备。那不是北京市民所能单独要求的，暂且不讲。我要讲讲北京市民可以办到的、应该要求的单独需要。

我把北京市民生活应该改良的地方，捡那重要的，一条一条的写在下面：

一，我们要注意那崇文门税关于我们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调查他，监督他。要是于我们生活上有重大的影响，就该有一种市民的活动对付他。

二，初租房的要出三个月份租金和那买东西要门底钱，都是恶习惯，都该打破。

三，试办消费公社。

四，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

五，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

六，多立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街上的乞丐应当禁止：幼年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孤儿院，由校或院给他衣食，教养成人，去自营生业；中年的人送入贫民工厂作工，贫民工厂应该是公立的，或对私立的加以严重的监督，以防资本家借慈善为名从中取利；衰老的人送入恤老院。

七，扩充济良所，有愿入所的娼妓，不问他受虐待与否，一概收容。济良所应该是教育机关兼着工厂的组织。

八，报纸派送，都很迟缓。应由报界公会和一般阅报的市民合力要求送报人改良。在电车未设以前，可利用脚踏车。

九，汽车在行人拥挤或街道狭隘的地方横走乱冲，很是危险。因为没有电车，一条逼窄的马路上，有许多马车、人力车、骡车、手推的车等等，并步行的人、担货的人，来往不绝。汽车尽其速力通行，很容易轧伤行人。且汽车过处，汽笛怒鸣，黑尘腾飞，殊与人以不快之感。应该：(甲)限制汽车的速度；(乙)加重汽车使用税；(丙)随时把汽车所有者的人名、住址和他汽车上的号数编成表簿，听公民自由领取，以便路上看见某号汽车有不法违章的事情，就可以告发或用邮片直接诘责。实行人民警察，以补官吏警察之所不及。

十，赶快修造市营的电车，使我们小民少在路上费些可贵的时间，吃些污秽的尘土，作同类的牛马，膏汽车的轮皮。

十一，电车没有修成以前，人力车夫的生活，也应该改善：(一)令车主随车设备卫生口袋(备车夫带在嘴上的)一具，雨衣雨帽各一具；(二)车夫的衣服应令勤加洗涤；(三)供车夫寄居的小店，应加监督，并令附设简易而且清洁的浴所。

十二，宜由市设立价廉而且清洁的平民浴所多处。

十三，宜由市设立平民食堂多处，使小食店赁居其中，以免劳工社会露天饮食的苦。

十四，街口巷里的屎尿，应严加取缔。臭气熏天的厕所，应该改造。设备适于清洁的厕所，应该添设。

十五，粪夫团体，应由警察厅加以编制，为之设备一切器具及一切卫生设施。下水沟亦须改善以图公众卫生。

十六，公立医院太少，应该多设。

十七，介绍佣工所，应与以严重的监督。注意女工住居的清洁，及勒索女工的事情。

十八，电灯电话的设备，应勤加修理，以防危险。电灯价值太贵，电光不足，市民对于电灯公司应有正当的要求。电话司机人不勤敏，不亲切，应改用女工。

十九，公园一律公开，不许索费，并将北海景山等名所一概开放。每个公园里，均设一极大的运动场。街旁的树木，应该多栽。洒街多用水车。

二十，妨害卫生及清净的工厂，不许设在住宅区域附近。(我的理想的都市，文化区域、工业区域、政治区域、住宅区域应该分开。)

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很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1919年9月21日《新生活》第6期　署名：守常)

难兄难弟

中国的元老，要亲到大成殿磕头，日本的元老，想在东三省建立一座伊势大神宫。中国政府忙办文、法官考试，日本政府忙设国民文艺会。都是为防止他们眼里口里的过激思想。真是难兄难弟的国家。

(1919年9月21日《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秘密……杀人

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现在近畿一带瘟疫流行，死亡很多，官吏都严守秘密，听其自然传染。唉！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

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呢？很是一个疑问。要说是自然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

(1919年9月21日《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圣人与皇帝

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师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

(1919年10月5日《新生活》第7期　署名:孤松)

文治国庆

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邪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明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1919年10月10日《新生活》第8期　署名：孤松）

应考的遗传性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摸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什么残酷的制度，把我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1919 年 10 月 26 日《新生活》第 10 期　署名：孤松)

牺　　牲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谁是“有实力”者？

有人说“胜利终归有实力者”，这话诚然不错。可是到底谁是“有实力者”呢？是那些有钱的人么？若是工人不甘作他的奴隶了，他那“实力”又在哪里？是那些带兵的人么？若是兵士不愿听他的指挥了，他那“实力”又在哪里？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文官考试，听说三千元可以买得一个。你愿得官，我愿得钱，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也算是一个公平买卖，我们没得可说。独有那应考诸君的神圣人格，被蹂躏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为他们抱憾！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掠夺物品的遗迹

一群告化子拥着一顶红轿，帘幕封得紧紧的，几个人抬着飞跑，好像掠夺来的物品一样。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妨害治安

“妨害治安”!“妨害治安”!在这句话的声音里,常常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有自由公民被囚禁了。但我要问,这个“治安”,究竟是谁的“治安”?妨害大多数“治安”的,到底是谁?我们大多数人的“治安”,并不太奢,并不过分,也只求个穿衣吃饭而已。

我们“治安”范围,减到穿衣吃饭,应该无可再减了,你们还不答应,还要把我们穿衣吃饭的“治安”都牺牲了,供你们少数人奢侈淫乐的“治安”,你们拍拍良心,到底是谁妨害谁的“治安”?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哪里还有自由

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邮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随便扣留。约法上明明有书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邮电可以随时随意派人检查。可怜中国人呵！你哪里还有约法！哪里还有自由！

(1919年11月16日《新生活》第13期　署名:孤松)

被裁的兵士

裁兵是一件好事，因为驱可怜的同胞去杀可怜的同胞，是我们最痛心的。不过我们要问：这兵究竟是谁招的？招了为什么又要裁呢？呵！我知道了，招兵的人，现在官也到手了，财也发足了，国家的粮饷也弄空了，现在你们才知道要裁兵了。但是裁兵后兵士的生活问题，你们也曾想过没有呢？

(1919 年 11 月 23 日《新生活》第 14 期　署名：孤松)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1919年10月12日）

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1919年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

“中日亲善”

日本人的玛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1919年12月7日《新生活》第16期　署名：孤松）

主　义

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

（1919年12月7日《新生活》第16期　署名：孤松）

“用民政治”

“用民政治”这个名词，是山西的产物。我看见了他就以为奇怪。因为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但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着危险万分。可是“用民政治”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解释？用民的人是谁？用民要作什么？我还是不知。我只听他们说“用民政治”就是“道德金钱主义的政治”，只知道这是山西阎锡山特别发明，得文治总统头奖的制品。

（1919年12月21日《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工　读（一）

中国乡村里有句俗话说得很好，就是“耕读传家”。现在家庭制度渐就崩坏，“传家”二字已没用了，可以改为“耕读作人”。是一句绝好的新格言。

（1919年12月21日《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工　读（二）

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哪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1919年12月21日《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大 联 合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1919年12月28日《新生活》第19期　署名：孤松）

史　观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

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

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僿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

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

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1920年《史学思想史》)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理想表现于社会上，或谓以全体而为统一的表现，或谓以部分而为对立的表现。主后说者谓理想之对立的表现者，为政治，为法律，为经济，所以社会哲学云者，有人释为论社会的统一的法则性的东西，亦有人释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

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的东西，固不止于政治、法律、经济等，他如学问、道德、美术、宗教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同有其历史。然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再狭隘一点，只有政治的历史被称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在历史以内。这样子一解

释,历史哲学由范围上说是社会哲学,而由内容上说便是政治哲学,这未免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

今欲论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必先明历史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今欲明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最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述一述。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来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尔在一八七七年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第一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

相对于马氏的历史观,有一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在中国及日本,这派历史家很不在少。他们大抵把历史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为历史

学。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然则马氏的历史观与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其所执以为中心者虽彼此各异，而其于以社会变迁为对面的问题一点可谓一致。

由马氏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以经济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那么由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似乎以政治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应该是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然于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的学问的性质，只认以政治为中心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罢了。

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派历史家，虽在今日，犹以为于马氏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能发见因果的法则，此点实与马氏的意见不同。然其以历史学的目的为与自然科学相等，在于法则的发见，则全与马氏一致。而于此点所受马氏的影响者亦实不为小。要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

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摘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载于1920年《史学思想史讲义》）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

例如政治，从前是以君纲臣，以官治民，以中央统驭地方，是纵的组织。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各地方联合起来，抗制中央集权。

次如经济，从前是以富佣贫，以资本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

次如社会，从前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贵君子，贱野

人;贵阀阅,贱平民;贵男性,贱女性,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力者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劳心者阶级,野人阶级反抗君子阶级,女性阶级反抗男性阶级。

次如家庭,从前是以家长统治家属,以父兄统治子弟,以夫纲妻,是纵的组织。现在子弟要脱离家长的势力,妻要脱离夫的势力,离开家庭,加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就变为横的组织了。

这个变动的主因,就在经济上有了变动。从前的经济组织是纵的经济组织,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是纵的组织。现在的经济组织,正在向变为横的组织方向进行,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向横的组织方面进行。

看现今世界的趋势,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大,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由此看来,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

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

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

（1920年1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　署名：守常）

低级劳动者

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1920年1月18日《新生活》第22期　署名:孤松)

整顿学风

五四以来，学界的自由思想风起云涌。有些卑鄙无良的人，觉得这种思想的变动，终于他们作恶的生活不甚方便，乃妙想天开，说要整顿学风。我说：你们胆子好大，居然要整顿超越一切的思想了！好！我且看你们整顿的结果如何！

（1920年1月18日《新生活》第22期　署名：孤松）

“特别体恤”

傅岳棻复北大校长论薪水发现事的信里，有一句“特别体恤”的话。这全和那“开导……”的话是同一口吻。我现在奉劝傅先生！教职员的精神上知识上比你丰富的多，恐怕你老先生配不上说开导他们呢！他们劳精瘏口，教育这一班青年，很辛苦的。公家给的薪水，是他们高尚劳作的代价，是他们当然的权利，谁配对他们说“体恤”的话！国家银行发出的纸币不能兑现，他们忍受了好几年了。他们真是“特别体恤”了你们！

(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知识阶级的胜利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精神解放

现在是解放时代了！解放的声音，天天传入我们的耳鼓。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完全消灭。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1920年2月8日《新生活》第25期　署名:孤松)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今日亚细亚诸民族的青年运动，皆是由黑暗向光明的运动。

中华青年的反抗强权运动，日本青年的普选运动　劳工运动，朝鲜青年的自治运动，表面上、形式上虽有不同，且有互相冲突的地方，而精神上、实质上皆本于同一的精神，向同一的方向进行。

亚细亚青年的改造运动，既有相同的渊源，又在同一的方向进行。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

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

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就是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

亚细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是不可掩的事实。亚细亚青年的解放运动、改造运动、光明运动，自然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下手，也是自明的道理。

请看！在朝鲜境内造成民族的仇怨、施行残忍的政治的是什么东西？在西伯利亚造成民族的仇怨、演成民族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华大陆造成民族的仇怨、酝酿未来世界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不用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了。要想扫除这些怨仇、祸患，全亚细亚的青年都该负重大的责任。

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假使日本的人

民，一旦声明承认朝鲜民族的自由，我们的欢欣，我们的钦佩，比对于劳农政府的对华通牒，还要增加十倍。因为这个精神，和俄人的精神一样伟大；这个事实，影响于人类生活更要重大。

我们相信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我们大家安安宁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哪有仇怨。

世界都是光明啊！

人类都是同胞啊！

愿我全亚细亚的青年努力！

1920年4月30日在北京

（1920年8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署名：李大钊）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

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

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满清三百余年的皇基，当不得民众主动的革命军。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最近如军阀魁领的段祺瑞，赞成共和则胜利，讨伐复辟则胜利，一至反抗民众，则纵有外国军阀的后援，亦终归于一败涂地。这真是眼前的好教训！

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

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固然有些私利的关系因缘附凑于其间，但是真实胜利者只是我们民众，其余的分子不过是攀缘他的一种附属品。倘若这种附属品不自知此理，而僭夺民众的胜利以自豪，则其复亡之速比袁、段更甚。我们应该自凭其胜利而勇进，以建树未竟的事业。我们要这次战争的军前胜利者自己了解他不过是一个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

我们应该赶快随时随处自由集合国民大会。这种国民大会，不拘一定形式，不待政府召集，全国公民要自动的愤起，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把目前解决时局的办法，简单而且重要的标出几条，交给南北政府去办，他们如不按民意去办，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种制裁。安福国会，是非法的东西，当然无效。旧国会时期经过太长，中更迭次变乱，其中分子早已七零八落，不足代表我们了。我们可以本着选举的权源，召还他们，但不可请求那个政府解散他们。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召还，那是他们自己表明他们不是我们的代表，任他受若何的处置，也与我们民意机关的尊严无损，那时什么人去解散他们，我们都不管了。其余必要的办法，都可一一列举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本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诸大精神，发布一种神圣的民权宣言。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我想只有这种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才是真实的国民大会。只要真实的国民大会自动起来，那就依一种改造的选举法召集一种国民大会也好，依旧存的选举法召集

二届国会也好,他们都要受这真实的国民大会表示的意思所支配。他们不过把已经粗具的概括的表现的民意,依一定的形式,精详的整理出来,做民众的打字机罢了。大家不要说这种不合一定形式的国民大会没有效力。五四以来,罢免曹陆,乃至此次打破一派军阀,摧除安福,哪一件不是这种国民大会的效力!若不自动的集合国民大会,专等少数代表的国民大会去做,其结果必与洪宪参政院安福国会等。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郑重的请大家注意!望大家愤起,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这就是永久的人民大会的基础。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

(1920年8月17日《晨报》 署名:李守常)

变革的原动力

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今年北方旱蝗并作，灾区很广，才是初秋，已经饿殍满野了，等到明春，更不知惨到什么样子！军阀财阀政客们，还是旁观坐视，依样横行。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

(1920年10月17日《新生活》第41期　署名:孤松)

现代的女权运动

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

凡在“力的法则”支配之下的，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凡对此“力的法则”的反抗运动，都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运动。妇女屈服于男子“力的法则”之下，历时已经很久，故凡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则”的反抗，都为女权运动。这种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

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

就在白人所居的乡土，亦有多处女权运动才见萌芽。在东亚，在非洲，妇女底羁绊依然未全打破。但在此等地方，妇

女的时代亦渐发见曙光了。

女权运动底国际的组织如下:妇女国际会议以各"妇女国民会议"底主席职员组成。一国底妇女俱乐部,为施行一定的普通政纲都可以加入一个国民会议。第一个国民会议,一八八八年成立于北美合众国。随后在坎拿大、法国、瑞典、英伦、丹麦、荷兰、澳洲、瑞士、义大利、奥国、诺威、匈牙利等国均有了这类的组织。

这妇女国际会议所代表的妇女数目,尚无统计。彼底会员大约将近千万人,国民会议只许以团体加入,不许以个人加入。构成妇女国际会议的各国民会议的会长,专以伊们的主席职员的资格列席。

妇女国际会议是一个促进有组织的国际的女权运动的永久机关,这是一八八八年在华盛顿成立的。

妇女参政运动是女权运动的另一形态,亦同样地依国际的形式组织起来。但对于女权运动是完全独立的,妇女参政是为有组织的妇女所提出的最急进的要求,后来在各国为急进的女权论者所拥护。伊们认妇女参政是女权运动底入门,由此可以达于更远大的目的。所以国民会议会员底大部分,不能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把妇女参政加入伊们的政纲。然至一九〇四年六月九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关于此点已有可决了。

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华盛顿成立后,不久在柏林亦有一个代表八国的妇女参政同盟发生。这个同盟所代表的八国,是北美合众国、威多利亚、英伦、日尔曼、瑞典、诺威、丹麦与荷兰。这个同盟与联合会联络起来,从此以后妇女参政运动便成了女权运动中最昌盛的部分。这曾声言过要在五年终再召集第二次会议的"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一

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间已经开了三次会议(一九〇六年在 Copenhagen,一九〇八年在 Amsterdam,一九〇九年在伦敦),会员扩张到二十一国(北美合众国、澳洲、南非洲、坎拿大、大不列颠、日尔曼、瑞典、诺威、丹麦、荷兰、芬兰、俄罗斯、匈牙利、奥大利、比利时、义大利、瑞士、法国、勃加利亚、塞尔维亚、冰岛。)第一次的会长是加特夫人(Mrs. Carrie Chapmae Catt)。

女权运动的主要的要求在各国都是相同,此等要求可大别为四:

一、属于教育者: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

二、属于劳工者:任何职业选择的自由,与同类工作的同等报酬;

三、属于法律者:民法上,妻在法律前应与以法律的人格的完全地位并民法上的完全权能。刑法上,所有歧视妇女的一切条规完全废止。公法上,妇女参政权;

四、属于社会的生活者:须承认妇女之家庭的、社会的工作的高尚价值与把妇女排出于各种男子活动的范围以外生活的缺陷、粗粝、偏颇与单调。

各国底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但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在澳洲、在英伦、在北美合众国,这两种运动全无敌对的形迹。但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这是因为中流阶级的妇女没有彻底的觉悟的原故。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这个道理,与美国劳工团体宣言赞助妇女参政运动的道理全是一样。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

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此外，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

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就是一个显例。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指定 Clara Zetkin 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一九一五年在 Berne 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这又为女权运动开一新纪元。

一个公正的娱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辅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性，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国际的女权运动和国际的劳工妇女运动的起源就在全世界对于此等原理的漠视。

生活上职业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Canon Care 劝告英国工人道：

"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乌有。你可以成为强有力与骚乱，你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你可以实行革命，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这几句痛言我借以奉告世界上未曾解放而方将努力作解放运动的妇女，特别是中国今日的妇女。

(1922 年 1 月 18 日《民国日报》副刊
《妇女评论》第 25 期　署名：守常)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常听人说，某派宗教，颇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等观察，适与我的观察相反。

先说宗教与自由。

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既信仰神，那么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盖人类不容异己的意念，实从根性而发生，至于所重视的事物，其不容异己的意念更甚。所以笃信的教士，无论他属何宗派，恶异喜同的感情，几乎都是一样。欧洲宗教改革的发端，实因反抗罗马公教的压制而起，但其党同伐异的情形，新宗与旧宗相差无几。后来门户纷争的结果，只有分立，没有全胜，于是弱小宗派，乃揭崇信自由的旗帜以

求自存。这样看来，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必到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我们的非宗教运动，就是要申明这个道理，使人们知道宗教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要想依自己心灵的活动，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作起不可。那么我们非宗教者，实在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

次说宗教与平等。

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原来宗教的成立，多是由于消极的条件：(一)强力的缺陷。原人的生活，处处受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故常感自然力的伟大，而觉自己的力量缺乏，起先看见雷霆、地震、火山、洪水、暴风、天变、地异、日蚀、月蚀、猛兽、毒蛇等自然界的变象而发生恐怖，后来对于自然界的常态，亦生敬畏。这时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自称能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抵抗力者，又或在这变异时境中能泰然自若而有几分应付变异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有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仰。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一。(二)身体的缺陷。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有时忽罹疾病，原人不知罹病的原由，辄归于神的降灾。这时有能对于病苦之将至为预告者，或于救济病苦有几分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畏。古者巫医并称，如今宗教与医尚有密切的关系，便是明证。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二。(三)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原人对死，亦生恐怖，而常忧惧。故有能预告其死者，或对于死与一种慰安者，——如死后生活的保障亦是一种对于死的慰安

——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故宗教必谈死后，必说来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三。(四)品性的缺陷。罪恶的自觉，自原人时代亦既存在，惟关于简单明了的事为然，特别是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此时有能功之为罪恶的改悛者，有称为有能赦免罪恶的全权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优者强者，而为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宗教家至今尤重独身生活，即源于此，而忏悔一端，犹为今之宗教所注重，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四。(五)运命的缺陷。人之处世，祝福无端，原人于此，往往疑有主宰，操人运命而能与祸福者。此时有能预告祸至者，或能为祷告以免祸祈福者，均成为优者，而为一般人所敬畏。故宗教不能离于祸福观，而祈祷至今犹为宗教上的一种仪式，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五。就是祖先崇拜的起源，虽由于"与自由有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条件，但其生前，实为家庭的长上，而于教养及其他生活上为优者。由此类推，伟人崇拜，英雄崇拜，国君崇拜，都现出优劣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看来，宗教本质全系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欲依此以实现平等的理想，恐怕很难了。

再次说宗教与博爱。

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的。但我很怀疑，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人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其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

与资产阶级争抗?是不是以此欺骗无产阶级而正足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是不是听到这等福音便抛弃他们现世的幸福而预备入天国?这是大大的疑问。

(1922年6月《非宗教论》 署名:李守常)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若把他的光芒万丈飞翔上腾的羽翮,拘限于狭隘的唯知论者的公式的樊笼中,决不能得到他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Shelley)惠特曼(Whitmen)辈抟扶摇而上九霄。

我们怕把他的精神的广大弄狭小了，怕把他的精神的生机弄死僵了，姑称他为平民主义，称这种精神表现于政治上的为平民政治。

平民主义原语为(Democracy)，在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波里克鲁(Pericles)(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生四百二十九年死)时代，亦是一个新造语，当时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有些人觉得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有立这个新名词的必要，故终能行用。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使用此语，取义还各不同，例如亚氏用之则当其民主政治(Polity)的变体，含有暴民政治的意味；而鲍莱标士(Polybios)用之，则当亚氏的民主政治(Polity)。

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语源，系由 Democ 与 Kratia 二语联缀而成。音转而为 Democracy。Democ 意为"人民"(People)，Cracy 意为"统治"(Rule)，故 Democracy 一语，可直译为"民治"(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但演进至于今日，此语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最初"统治"的意义久已不复存了。

马萨莱客(J. G. Mosaryk)有几句话诠释现代的平民主义，可谓精当之至。他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的技术的难问题。"含有统治意味的平民主义，仍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于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

的技术。

普通诠释平民政治的人，都是说“平民政治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但是看破此语是虚伪的，不止马洛克 Mallock 一人。马洛克在他的“The Limits of Pure Democracy”里开宗明义即揭破此言的虚伪。

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列宁(Lenin)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苦瓦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曾竭力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后来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里，并别的著作里，亦尝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但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在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下，自然亦没有两性的差别了。有人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

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此语出世不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位置。此语的创立，亦和“Democracy”是一样，借重于希腊语丰富的语源。希腊语“Ergates”是“工人”(Workers)的意思，故“Ergatocracy”意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故可译为“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一期的工人政治，实有“统治”(rule)的意味，并且很严，大权全集于中央政府，以严重的态度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cracy 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 (Ergatoracy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orkers, for the workers, by the workers)。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鲍洪(Bohun)氏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谈平民政治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政治者么？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想你们要平民政治么？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是工人政治者，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政治是资本主义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

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政治一语给那自由的中产阶级和那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一段话可以表示他们弃平民政治而用工人政治的理由。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Soci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区别。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昂格思序文刊布时候,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名词用得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了。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苦瓦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

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 署名：李守常)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我们在这严肃的、伟大的、壮烈的、仁慈的纪念日，要提议一件我们全国人民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对俄外交问题。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1922 年 11 月 7 日《晨报》副刊　署名:守常)

“今”与“古”

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过去的怀思。这一派人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曾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知识。许多人以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上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的衡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

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的贡献独多，知识上的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

远，由那个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无愧。

继鲍丹而起者则有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对于古人表相当的尊敬，并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认古人的权威，于科学进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碍，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权威的衡轭。他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会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除去世界一小部分的境界与国家，他们全不熟悉。在所有他们的系统与科学的想象中，难有一个单纯的经验有助益人类的倾向的。他们的理论是立在意见上的，从而科学在最近两千年间静止的停留；而立在自然与经验上的机械的艺术，则渐长而增高。

倍根指出 Antiquity 一语迷误的义解，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真值得称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与增加的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生于其中的年代。论世界的年龄，我们实是古人，那些希腊人、罗马人比我们年少的多，如同我们看重一个老年人，因为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比一个青年人的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知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

经验所增积，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

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学，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或者航海及未知地的发见，与倍根以感印者，比与鲍丹者多。

倍根认地球通路的开辟与知识的增长，为同时代的产物。此等事业，在今世大部分业已成就，挽近的学术，并不劣于从前两个学术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希腊、罗马及现在是历史上三大时代，希腊、罗马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国家，但在那些时代，自然哲学亦未有何进步。在希腊是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们的精神；在罗马是沉思与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学上，最大的智力，都贡献于市民的事务。在第三期，西欧民族的精力，又都为神学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实在有些最有用的发明，到了冥想与理论的科学的开始，这等有用的事业就停止了。在过去的人类史上，许多事物的进步是迟缓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觉察过去的发明的错误而求所以免除之，现在很有确固的进步的希望。

倍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进步的艰难，不是起于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于人类的误解，此误解耗费时间于不当的目的。妨阻过去的过失，即是创辟将来的希望。

但他的新时代将来的进展是否无限，他于此未加研考。

今古论战的舞台虽在法兰西，而此问题实为一个义大

利人所提起。此人为谁？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绘当时叙事诗人讽刺诗（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他喜于暴露他的时代的偏见，而倡言新学说，他因为攻击 Petrarch，Homer，Aristotle 诸人，在义大利招了很大的诽谤。最早的古今人功绩的比较发见于 Miscellaneous Thoughts，这是他在一六二〇年刊行的。他说此问题是当时流行的争论事件。他对此争论，于理论的空想的、实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彻的比较，与以公平的裁断。

有一派人主张艺术依经验与长久的工夫能致完善，所以现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对于此说首先加以批评，他说此理由不甚坚固，因为同一的艺术与学问，不永是不间断的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时传入劣者手中，所以渐趋退落，甚且至于消灭。例如罗马帝国衰亡时的义大利，当时有很多世纪，觉艺术降在平凡以下了。换句话说，只有假定没有联续的断裂，此说当可承认。

他作出一种比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许古人以星星点点的优越，同时今人在全体上远胜于古人；他所考察的范围，比那些自限于文学、艺术的争论者广，文化的物质方面，甚至于服装，均在他所考察的范围内。

他所著的 Thoughts 一书被译成法文，此书恐已为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剧学家，以曾参与创立法兰西学院（ Academie Francaise）为人所知。忆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学院既成，他即刻当着那些集众讲出一段议论，猛烈的恶口的攻击 Homer，这一段议论在法兰西煽起了争论，并且引起特别的注意。Homer 自经塔桑尼攻击以后，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别鹄的。他们以为，假如他们不信任 Homer 的主张能够贯彻，他们便可以得到胜利。

当文艺复兴的时候，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极其优越。为便于促进自由的发展，此权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倍根及其他诸人，已竟开始了此种伟大的运动，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愈益严重，愈益坚决，他的态度愈趋于不易调和的程度，他没有一点像倍根的对于古典文学的尊敬，他颇以忘却幼年时曾经学过的希腊文自夸，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对于过去严格的完全的打断，并一个完全不借重于古人的组织观念的系统。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期望将来知识上的进展，从而他认知这个智力的进展，将有很远的效果及于人类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他视道德的物质的改进为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倚赖。

根据世界现今是较为高龄、较为成熟的见地，是认对古人独立的态度，已竟成了很流行的观念。倍根、笛卡儿并许多受笛派影响的人们都是这样。

巴士库儿(Pascal)是一位科学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显，他说，当那么多的世纪间，人类的全联续，应看作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学问；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阶段，此普遍的人，为他在从前的阶段曾经获得的知识所惠利，而他现在是在老年时期了。

对于责笛氏以对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们，他曾为答辩，说他拒否他们的权威，便是还他们以模仿的敬礼，便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隶的随从他们的人们好得多。巴氏又说：待遇我们的古人，比他们所示以待其先辈者益加隆敬，待遇他们以一种他们值得受自我们的不可信的隆敬上，因他们未曾对那些在他们上享有同样利益的人们与以

那样的看待。天下宁有比此还不 的事么?

巴氏亦承认我们应该感念 ,因为我们在知识的增长上能优于他们。他们已达于一 点,使我们能以最少的努力跻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 我们立在较高的平面上,少艰难亦少荣誉。

最优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 于笛派理想的人们。白衣士罗伯的议论出世后好些年 骚林(Desmaretsde Saint Sorlin)又起来作崇今派的战士 他已成了一个梦想派的基督教徒,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个理由。他和白衣士罗伯同是劣下的诗人。他说基督教的历史贡给些文辞,比那些曾为 Homer 及 Sophocles(希腊悲剧诗人)所论的,很可以感动一个诗人。他有几首诗是战胜 Homer 的示威运动。约在同时,在英兰亦有一首叙事诗响应圣骚林的争论。

圣骚林已略知此问题含有更广的范围。他说:古代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学问,那样的富裕,那样的堂皇,如同现代一样;现代实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过去世纪的果实与战利品,并有力以判断先辈的发明经验与错误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时代都产生完全的事业,但他(自然)关于人的创造却不是这样,这必须要改正;那些生于最近时的人们,在幸福与知识上,必超过以前的人。他的话里含有两个要点。一为自然力永在的断言,一为现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于幼稚一样的观念。这是倍根诸人所曾经论过的。

圣骚林拥护今人的挑战引起了白衣卢(Boileau)拥护古人的迎敌。圣骚林濒死之前,很郑重的以为今人战的责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劳耳(Charles Perrault),即

此可以看出今古的争论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王朝时的法兰西，一般的气压很于崇今派有利。人们觉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与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奥加士大(Augustas)的时代比美的，没有什么人发出“我生不辰”的叹声。他们的文学的艺术家，若 Corneille、若 Racine、若 Moliéré 合于他们的嗜性那样的强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们不愿给他们以别的等位，他们不耐听那希腊人、罗马人进到不能达到的优越的断言。Moliéré 说：“古人毕竟是古人，我们是现今的人。”这可以表示当时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劳耳以《路易大王的时代》的名称印行他的诗歌。现代的启蒙优于古代是他的论旨。

帕氏对于古人取比圣骚林更为有礼的态度，而其批评论尤巧。他说，希腊罗马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们祖先崇为神圣，但在现今，柏拉图宁觉可厌了；而那不能模仿的 Homer，设若生于路易大王的朝代，当能作更好的叙事诗。在帕氏诗中，有确认自然的永远势力在每一时代产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语句。

《路易大王的时代》是一个简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续着又发表一篇彻底的著作，就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是在一六八六——一六九六年间以四部分出现的，艺术、雄辩、诗歌、科学及他们的实际的应用，都详加讨论了。他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发表这个讨论，这对话的人们，一为热心拥护现代的战士，他作崇今的论战；一为拥护古代的献身者，他是一个明知难以否认他的反对者的议论，犹且顽强的固执他自己的见解。

帕氏认知识与时间经验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须伴随古

代的;最近的来者承袭了他们先辈的基业,而加上他们自己的新获得。

这后人较善、来者胜今的前提,似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不相容:在知识上、艺术上,我们优于黑暗时代的人们,这固当承认,但你能说第十世纪的人们是优于希腊人与罗马人们么?塔桑尼已经涉及此问题,帕氏答此问题曰"一定不能",因为联续中常有断裂的原故;科学与艺术同于河流,他的进路的一部潜流于地下,忽而开发奔流,向前跳跃,其丰沃与在地下跳跃一样。譬如长期的战争,可以迫制人民们蔑视学问,把所有他们的元气都掷于自保的益觉迫切的必要,一个无知的时期可以延续,但随着平和与福祚,知识与发明,将重行开始为进一步的发展。

他不主张今人在才能上或脑力上有何优越,在《路易大王的时代》中,他确认自然不朽的原则,自然犹且产生像他曾生过的人们一样伟大的人,但他不能产生更伟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狮子,他的狞猛,在我们今日并与在亚历山大大王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时代,最善的人在气力上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功业与作品是不平等的,若与以同等的势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为科学与艺术,都靠知识的积聚,知识必然的与时俱增。

但此论能用之于诗歌与文学的艺术么?诗歌与文学的艺术界,是交战者(帕氏亦包在内)最有兴味的范域。此可证明现代能产生些诗家文学家,其优越不亚于古昔先师,但此能证他们的事业一定超于古人么?此驳论逼得帕氏不得脱逃,而帕氏答复则颇巧妙:娱人心情是诗歌与雄辩的职分,而欲有以娱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奥秘比洞察自然的奥秘较为容易么?或者洞察人心的奥秘费时较少么?

关于人心的情感与念望常作出些新发见，只以 Corneille 的悲剧而论，你在那里可以寻得比古代书籍的更微妙更细致的关于野心仇怨与嫉妒的映绘。在他的《比较论》的结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优越的时候，他为维持平和起见，论到诗歌与雄辩，暂作一个保留。

帕氏的讨论，陷于缺乏体现完全的进步的观念，他不止专注意知识上的进步，但他不注意将来，对于将来，没有什么兴味，他受最近的过去知识上的发展感印甚深，故他几不能悬想再有更益向前的进步。他说："试读英法的报章而一察那些王国的学院的出版，将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内在自然科学界作出的发明，比遍有学问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幸的知道我们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过去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事物的生长与进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受过一个新的增加与光荣的；我们的时代，在些种类上曾达到完全的绝顶，从有些年间以后，进步率很迟，想到差不多没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们妒羡将来的时代是很可喜的。"

对于将来的冷淡，即是关于将来的怀疑，是上述语句的注释，而与世界已达于他的衰老时期的观念相合，故吾言帕氏的知识进步的观念，尚不完全。

于法兰西以外，英国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论战。

一个神学家名叫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刊行了一本六百页的书，以诘责当时普通的错误——宇宙衰朽的错误。他并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纪气压下的书，全为人所忘却，他虽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学家外，难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证明在世界的政府里，上帝的权威与天命。这与当时流行的见解不相容，当时流行的见解，就是物质的

宇宙、天体、原子，均渐趋于衰朽，并那人于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见解。他的议论多获益于读鲍丹、倍根诸人的书，可见他们的思想已经激动神学家的精神了。

一个今古间的比较起于衰朽说的拒驳，与自然力确固的问题起于今古间的比较，一样是自然的结果。黑氏反对过分的推奖古代，正为此说可以助世界衰朽说张目。他所讨论的范围，比法国争论者的较广，他所争论的范围，不止含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并及物质与道德。他求所以证明精神上物质上没有衰朽，并那现代基督教国的道德，大优于异教时代的那些国家，基于基督教有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知识上亦有发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艺术与科学，断定今人在诗歌上与古人相等，其他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认退落说可以腐痺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为我们对于后人所该尽的义务。

他说："于是我们不要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虚影所阻拦，以使我们既不后顾那些可敬的先辈的楷模，又不向前预为后人谋。如我们先辈有价值的预为我们谋者，使我们的子若孙，亦以预为之谋者颂祝吾辈。如何的世代将以延续于我们，尚未确定，亦如未来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辈一样。"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长多久，是一未决的问题，但他有一个考虑可以慰安他自己并读者，就是世界的终结，尚未临近。

自然不衰朽，人类不退落，固可确认了，但那世界的终

结,不依自然法,并那人类文化的发长,任在何顷均可为神的命令所斩断的学说,其足以销沉人的希望,钝滞人的努力的锐利的影响,亦并不小。

黑氏持论的意义,在把阻碍进步学说的退落说,弄成一个特别研究的问题。他的书揭明此说与关于今古争论间的密切关系,不能说他与鲍丹、倍根诸子关于文明进步的理论有所增益。他所企图的历史的普通综合法,全与他们的相等。他说明知识艺术的历史与此外一切事务,如同纵览一种循环的进步,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发生、滋长、繁荣、废落与萎谢,于是经过一个时期后,又有一个复苏与再兴,以此进步的方法,学问的光明,由一民族传到别一民族,由东洋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既已为蛮人所不见者千有余岁,而又为Petrarch 及其当代人所复活。黑氏所陈循环进步的观念,颇与倍根所指摘的循环说相近。

倍根及十七世纪的思想家,自限其过去进步的观察于知的范围内,而黑氏对于古代的仪容道德,不惮与以攻击,能预见这社会的进步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要来到十八世纪阵头的。这是黑说值得我们注意的点。

黑氏的书出世以后,我们又得到格兰威尔(Glanvill)所著的《加的过度》(Plus ultra),又称《亚里士多德时代后知识的发展》。此书于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拥护成立未久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该会在当时颇受攻击,谓为有害于宗教及真实学问的兴趣。格氏愤古曲流对于皇家学会的压迫,乃起而树拥护的旗帜。他说他对于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撒、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见他的精神了。

他说皇家学会的职分，就是企图人类的设计，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蕴那样低，达到宇宙最上层那样高，扩张到广大世界的一切变化，目的在普遍人类的惠利。那样一种事业，只能以不能知觉的度数，慢慢的进行。这是一个累代的人均与有关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时代，只能希望作一点点，以移去些无用的片屑，预备些材料，安排些东西，以备建筑。我们定须寻求与搜集，观察与考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积聚。

神学的考虑，曾经重压过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则显然未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这四十年间世界进行的经路了。

斯普拉特 (Sprat) 是一个牧师，他于格氏的书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学会史》。他认科学可以扩张于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扩张其地域，基督教国的文化亦可扩到其他文化国及半开化国，他希望将来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于蓝的优越，希腊人胜过他们东方的先师，现代欧人从罗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遗留于他们的。

皇家学会建立于一六六〇年，科学院建立于一六六六年，使物质的科学，在伦敦与巴黎很流行。各阶级，都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骑士，若圆颅党，若牧师，若清教徒，都联合起来，若神学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贵族，若世爵，都夸扬倍根哲学的胜利，倍根播的种子，终竟成熟了。那些建立与赞美皇家学会的人们，对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Cowley)上皇家学会的赞歌，可以名为赞扬倍根的赞歌，亦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由权威的束制解放的圣歌。

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

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1923年2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社会主义释疑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纪念日，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

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比别人弄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

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做工，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哪里有像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动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的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先注意的。

(1923 年 9 月 7 日下午于上大)

(1923 年 11 月 3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李守常)

研究历史的任务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什么"史记"咧、"汉书"咧、"三国志"、"资治通鉴"、"念四史"……在西洋也可以找出什么"罗马史"咧、"希腊史"咧……等等的书。这类的书就是史吗？

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有时须靠记录中的材料。但要知道这些陈编故纸以外，有有生命的历史，比如研究列宁，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

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

明白了这点，那历史和历史材料的异点，便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们再讲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英文的史字(History)是问而知道的意思；德文的史字(Geschichte)是事体的意思。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

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所以福理曼(Freeman)说：过去的政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政治。他把政治和历史认成一个字，不会分离。

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

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他把人类生活作成一个整个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

生物学当然是研究生物的，植物学当然是研究植物的，人类历史也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生活，生活的全体——文化的了。但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离。譬如这座楼，可以分出楼顶，楼身和基础来。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

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

他不但发明文化是整个的，他并且把历史和社会的疆域分开。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活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

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但同是一个事实，人人的解释各异。比如实在的孔子过去了，而历史的孔子，甲与乙的解释不同，乙与丙的解释又不同，昔人与今人的解释又不同。人人解释既然不同，他整理以后，找出来自以为真确的事实，当然又不同了。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信手在我们中国历史里边找出几个例来看：

一、在中国历史神话期中，说我们的衣服器具有许多是半神的圣人，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这样记录，我和在座诸君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或者都以为是真实的。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现在借着科学的知识，发明一种新机器，也得费若干年月，在那蒙昧时代怎能这样迅速！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的动物。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

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念已大不同了。

二、中国古代的姓，如妫、姞、姬、姜等字，都从女旁，这些字何以都从女？前人的解释，多谓人因地而得胜。例如某某的母居姜水，故姓姜；某某的母居于妫水，故姓妫。但由我来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妫水、姜水的地方，是因人而得名的。因为有姓姜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姜水；有姓妫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妫水。姜、妫的姓都从女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母权时期，所以子从母性。我们再就社会的现状观察，姓张的村子，叫张家村，姓李的村子，叫李家庄，都因所在的姓氏而得名，决不是因为住在张家村才姓张，住在李家庄才姓李的。那些妫水、姞水、姬水、姜水的名称，也因为古代的人好临水而居，那水也就各因其姓氏而得名了。

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

三、就近二十年来河南所发现的古物，更可以断定旧日史书的虚伪。中国经济学上的名词多从具，如货字、卖字，贾

字等都从贝。按历史学家考察,最古的时期中经过一种靠贝为生活的时期。中国旧史的记录的:中国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造货币。但现在按河南发现的龟版文字,一为考察,那些上面所刻的字,并无从金边的字,而只有从贝的字。果然当时已是用金器时代,何以不能发现一个金字?

中国古书固然伪的很多,然在较为可靠的"书经"的"商书"篇亦是说:"具乃贝玉",当时贝玉并称,而不说具乃金玉。果然当时已有金属制造品,何以在殷代以前不发现一个"金"字?

到了后来"诗经"上才发现许多"金"字,往往"金"、"玉"并称,便有"金玉其相"一类的话了。

就此可断定,旧史所纪是虚伪的。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殷代以后到了周朝,才入了铜器时代,才有金属的制造品了。

这样的例举不胜举,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是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沉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

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Crote)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他所注意的未必是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菲薄希罗陀德。格罗

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真实的罢了。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从前的孔子观念,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苏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苏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苏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苏作传,辉皇孔子、释迦、耶苏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别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历史原是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原是进步的,不是固定的。我们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别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

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

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1923年11月29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李守常)

时

今逢《晨报》第五周年纪念日，吾乃就“时”的观念发生种种感想。“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周为岁之满，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为“晨”为“周”都是这大自然大实在流露出来的一体。

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

时是什么东西?吾曾以之问于玄学,问于认识论,问于心理学,问于数学,问于物理学,问于天文学,都只能以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有的物理学者说,他与“以太”有关。但是“以太”云者穷为何物?仙乎神乎,百般捉摸,不能得其正体。近来物理学者努力的结果,已知“以太”云者本无是物。欧洲有一种学问,名为 Chronology,译成国语曰编年学,曰纪年学,曰年代学,亦曰时学。我欲以时为何物,问之 Chronology。但这不过是研究时的计算,并未涉及时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又来告我,时是心造,因境而异。同一时间,欢娱则每恨其短,痛苦则每厌其长;怀人则一日三秋,乐生则百年旦夕。地质学家从旁窃笑,谓史学者把几千几万年间的经过,分成上古、中古、近古诸期,其间盛衰兴亡,纷纭热闹,杳乎久矣,而在地质学者看去,这不抵一朝暮间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吾侪尽自懵着头过这朝菌蟪蛄的生活罢了。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哲家者流,究时之义,竭虑殚思,不能得其象迹,乃有拟于空间以为说法者。谓时如一线,引而弥长,既被引者,平列诸点,有去来今。但以此喻说明时的递嬗,亦不合理。因此一线,既已引者,悉属过去,未曾引者,当在未来,现今之点,列于何所?我们知道,三世代迁,惟今为重,凡诸过去,悉纳于今,有今为基,无限未来乃胎于此。如兹说法,消泯了现今,亦即无异丧失了人生的奥秘。凡诸过去,将于何托?凡诸未来,于何承接?此种说法不能使人满足。我乃沉思,更得一义: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在未来。然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

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本乎此理，以观历史，以观人生，有二要义，务须记取：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逆返，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另有一义，随之而起。凡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都是一趟过的。无论是悲剧，是壮剧，是喜剧，是惨剧，是英雄末路，是儿女长情，都是只演一次的。无论是英雄，是圣贤，是暴君，是流寇，是绝代的佳人，是盖世的才子，在历史的旅途上亦只是过一回的。垓下的歌声，只能听得一次，马嵬坡前的眼泪，只是流过一回，乃至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就是我们糊里糊涂一天一天的过去的生活，亦都为一往而不可复返。看到此处，真令人惊心动魄了。人生既是这样可以珍重的东西，那么朝朝都有晨光，年年都有周岁，光阴似箭，一去不还，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欢天喜地的行动着，创造着过去。凡是遇在这一进不退一往不返的、只能见一面的、只能遇一遭的时的旅途上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

兄,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我们不要迟疑审顾的误了好时光,更不要此猜彼忌的留下恶痕迹。机会不可复得,因缘永难再遇。我们在这万劫长流中,大家珍重,向前迈进,走此一遭,必能达到黄金世界的境域。

在空间论前后,前在我们的面前,后在我们的背后。在时间论前后,却恰与此相反。一说前日,便是指那过去的一日,一说后日,便是指那未来的一日。这样说来,后日却在我们的面前,前日反在我们的背后。日常云用,毫不觉异,此果何故?我尝细思,这等言语很可以表示我们时的观念的错误,历史观的错误,人生观的错误。寻常设想,总以为时的首脑在于古初,时的进行的方向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吾人只是立在一旁,屹然不动。回过身来,向着过去方面看,这太古的机关车带着这些未来连续不断的时的列车,滔滔滚滚的,似水东流,直向荒古方面奔去,所以误认过去的一日转在吾前,未来的一日反在吾后了。这种时的观念所产生的历史观、人生观,是逆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虽以论坛权威如章行严、梁任公两先生者，亦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章先生则一面说，从前衣服既由宽大而趋于瘦小，今则复由瘦小而返于宽大，以证史相的反复循环；一面又说唐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汉碑，以证人文的愈趋愈下，似为一种循环的而又退落的历史观。梁先生则虽犹回顾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而不忍遽弃，但细味其为文，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我本崇今论者，深惧此等论坛权威将为怀古论者推波而助澜，用特揭出时的问题以与贤者相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这是区区此文的微意。总之，我认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今人设若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安见不及古人？安见不能超越古人？即让一步，承认古人有非今人所能及的，有非今人所能胜的，他也只是在历史上过一趟的，演一回的，不能因为今人的崇拜与怀思再来一次。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要知此一趟的经过，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永久传流，贯注于人类生活中，经万劫而不朽！”

(1923年12月1日)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署名：李守常)

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

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会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1924年2月16日《新学生》第14期　署名：李大钊)

列宁不死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

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僇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1924年3月30日)
(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
的《列宁纪念册》 署名:李守常)

新闻的侵略

前此北京及全国，一时均轰传中山先生逝世，于是全国震惊，京中有数家报纸且为文哀悼。造中山先生逝世之谣言的，是路透社与广州中国银行，可是后者的电报仅达于北京，而路透社之谣言则传播于全世界。自此项消息传出以后，除各地都受影响外，一时广州市面顿呈扰乱不安之象，人心惶惶。造谣者得此结果，自然是心满意足，乐不可支。而中国人的无事自扰，不能不说是食造谣者之赐了。我对于路透社造谣，又另有一种感想。

自经此次中山先生逝世谣言之传播，我们应明了外国的通讯社在中国宣传之可惊。路透社恃其在华之优越地位，仅发布一消息于中国各地，即可使全国革命分子的人心浮动，广州市面惶然不宁。它的魔力可谓很大的了。而我们看

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如东方、路透、中美等，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以图引起国际公管；表彰外人在内地之言论及事业，以坚华人对西人之崇拜。有时造谣惑众，如此次硬诬中山先生逝世，图乱广州时局。但是外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之发展，还不在此。最近如日、美争在中国建无线电台，亦是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国人习焉不察，每忽视外人在华之新闻宣传事业。实在，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即是一例）。此种新闻的侵略，只在中国才有。所以广州政府于此次谣言传播后，即毅然驱逐路透记者出境，不可谓非对人散播谣言的罪恶的正当处罚。但我以为路透社记者不仅在广州的应该驱逐，中国政府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

六月十一日北京

（1924年6月18日《向导》第71期　署名:T. C.）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役、日德之役，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挟战胜的余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奥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定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商团十余万于河干，

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的、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

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考一考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先生的诞生地是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广州很近,广州是中国开放海禁最早的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最初侵人中国的门户。西历纪元四世纪时,印度南洋一带已有闽粤人的足迹。十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是广州的繁盛时代,最初来广州的是亚拉伯人,欧人是西、荷等国人。一七八四年美舰"中国皇后"号到粤。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澳门的季节出张所,外国在那里设立商馆,只准经过行商的手与中国贸易。中国对于居留广州的外人,设有种种的限制。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伊利查别兹女士特许其有对华贸易独占权。到了一八三三年,对华贸易权才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私人商业手里。在这东印度公司有对华贸易独占权的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只是羡忌葡人先占的澳门,只是常常在广州的门户以外徘徊着,想伺一个机会进来占据广州,像葡人占据澳门一样;但是因为广东民众严密的监守,强烈的抵抗,终于没有能够偿了他的愿望。所以一八三〇年以前,中英商业的平准,还是于中国方面有利,银币不断的由印度、英国、美国输入中国。在那个时顷,英棉及一定限度的羊毛亦输入了少许。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像潮水一般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像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尽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着卖鸦片于华人,同时印人需求英国的制造品,亦全靠在印度的鸦片的出产。那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输出于印度的商品额

量日以增高，则其取自印度而须要卖给华人的鸦片额量，亦必随着增高。英国此时需要打破中国门户，不仅是为印度出产的巨额鸦片谋一尾闾，并且是为那在他本国畅旺出产的制造品谋一销售的市场。英人为达此目的，乃于一八四〇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雅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撒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

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闽粤一带以及海外的三合会(一名天地会)即是这种反清复明的秘密的团体。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亦曾容纳了三合会的一部。太平党与三合会的宗旨不能尽合的地方,约有二点:(一)太平党信耶教,而三合会信道教与佛教。(二)太平党主张于颠覆清朝以后建立新朝,而三合会则主张恢复明室。故二者未能完全合一。至于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满清人关时,已经与耶教思想有了接触。明室遗族在广东曾与罗马教皇有文书的往来。明皇族及其遗臣,那时已有百数十人加入耶教。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人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与耶教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看那太平党人的教主"朱九畴"、"洪秀全"的名字,便知他们的教门必与朱明孑遗洪门会党有所渊源。

太平天国的年代是由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正是英产业发长最猛的年代。这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青年们,身受外来的经济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满清人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严厉的禁吸鸦片,便是表示他们对帝国主义者以炮火护送来的毒物非常的厌恶,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看他们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平均性质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农民经济的要求。

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宗教感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的长胜军。

一八五〇年顷,英国产业有猛厉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危机的征象,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的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的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能下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计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观于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成立以后,英公使巡游长江过南京时,以炮艇袭击南京太平军的炮台。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上海时,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的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乱。一八六一年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一八六二年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送兵士及接济

军火。英法联军以武力干涉太平军入上海。英海军助清廷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一八六三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所谓长胜军，助平太平天国。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

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英法忙于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势力遂压迫到日本，以后各国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帝国主义压迫东方的大势。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

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〇〇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一九〇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1926年3月12日)

(《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咏 玉 泉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1]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
阿房[2]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
耗尽民膏是此声！

(1913年11月1日《言治》第6期)

---

① 玉泉：泉水名。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泉水流下山来，经颐和园，进入北京市故宫所在地的禁城及三海。

② 阿房：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规模宏伟瑰丽。这里将清末慈禧太后祝寿时修筑的颐和园以阿房宫相比。

有　感

愁尽人天唤奈何，
高楼风雨黯[1]笙歌。
伤心人有伤心泪，
洒向红颜[2]薄命多。

(1913年11月1日《言治》第6期)

① 黯：暗淡，言歌声渐渐停歇下来。
② 红颜：美女。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1]

班生[2]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3]。
去国徒深屈子[4]恨，
靖氛[5]空说岳家军[6]。
风尘[7]河北[8]音书断，
戒马江南羽檄[9]纷。

---

① 一九一三年九月，作者赴日本留学。这时，南方各省纷纷宣布参加在孙中山领导下的讨袁运动，即“二次革命”，但很快就为袁世凯的南下大军所扑灭。所以题中有“南天动乱”，诗中又有“无限伤心劫后话”的话。

② 班生：指东汉班超。班超曾投笔从戎。这里以班生喻从军的友人。

③ 曛：日暮。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1913年11月1日《言治》第6期)

④ 屈子：即屈原，《离骚》的作者，战国时楚人，做过三闾大夫。因遭谗言去职，被流放江南。后投汨罗江而死。戴叔伦《三闾庙诗》："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作者以屈子自喻，描述临出国的爱国心情。

⑤ 靖氛：平定妖氛。当指讨袁。

⑥ 岳家军：南宋初年，岳飞的抗金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敌多畏怖，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里是指讨袁国。"靖氛空说岳家军"，作者因讨袁军的失败而深深感到失望。

⑦ 风尘：战乱。因兵马所至，风驰尘扬，故云。

⑧ 河北：泛指北方。

⑨ 羽檄：也称羽书。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①

一声笳咽一腔泪，
万里城②环万仞山③。
最是多情今夜月，

① 筱舫、寿山均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筱舫，原名尼鼎云，河北任县尼家庄人。寿山，原名刘锡龄，字绶珊，也名寿山，河北滦县古冶王辇庄人。辛亥革命期间，沙俄图谋趁机入侵我国。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在派军支持下导演了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外蒙独立的丑剧。一九一二年八月，发生科布多事件，在沙俄唆使下，蒙军占领科布多，驱逐我军出境。随后，一九一三年，在俄国军事及各方面支援下，继续进犯内蒙。当年七月，在科布多边区与阿尔泰边区交界上的察罕·东肯附近，与我驻军发生激战，我军失利。帝俄派兵进驻科布多。这年夏天，北京政府陆军总部派尼鼎云、刘锡龄等押运一批军火

共君犹自出边关[4]。

(1917年4月1日《言治季刊》第1期)

送往科布多,是用大车运送的,途经潼关、甘肃,出嘉峪关,经过一年多时间,到达哈密。李大钊赠友人的这首绝句以及下一首《前意未尽更赋一律》,当是一九一三年秋天写的。

② 万里城:指万里长城。

③ 万仞山:古代周尺以八尺为一仞。万仞山,极高的山。

④ 边关:当指嘉峪关,自古为去西部边疆地区的交通要道。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策马玉门关，
不为儿女颜。
悲歌辞易水①，
壮士出天山②。
白草千层雪，
黄河九曲湾。

① 悲歌辞易水:《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去秦国谋刺秦始皇，临行太子丹及随从到易水河边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歌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得返。”

② 天山:亚洲中部的大山系，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西端伸入苏联中亚细亚。

遥知断肠处，
应有雁飞还。

1917年4月1日《言治季刊》第1期)

复辟变后寄友人

复辟①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②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③，
歌舞依然上画楼。

① 复辟：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立溥仪在北京复辟帝制事件。

② 惺亚：白坚武又名惺亚，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河北交河县泊镇人，曾与李大钊过从甚密。白当时在江西督军李纯部下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后又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僚。“二七”惨案后，李大钊与之绝交。

③ 英雄淘尽大江流：为祖国流血奋斗的英雄们不断涌现，正如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样，滔滔奔流不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一代声华[4]空醉梦，
十年潦倒[5]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万山无词句[6]，
只应共泛五湖舟[7]。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3期)

④ 声华:声誉。白居易《晏坐闲吟》:“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南潦倒翁。”潦倒翁,一作“老倒翁”。

⑤ 潦倒:失意、不得志。

⑥ 忆别万山无语句:万山,万重山。作者借写景抒怀,以万山比喻重要艰难险阻,说回忆过去历尽艰险,而今天结果如此,只有告别,无话可说。

⑦ 只应共泛五湖舟:只有一道去浪迹江湖。

山中即景（三首）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二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三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这首诗是一九一九年夏天作者在昌黎五峰山写的，刘半农根据所藏原稿收入星云堂影印的《初期白话诗稿》，列为第一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表了两节，与刘农所发表的原稿墨迹一致。白坚武在《惺菴日记》原稿中记了这首《山中即景》，内容则略有出入。白在八月十九日日记中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为记之：

《山中即景》：(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处。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

据此可知这首诗是在这年八月间写的。看来李大钊寄给白坚武的是诗的初稿，后来发表时作了修改。第三首则从没有发表过。这首诗是从白坚武的日记里发现的。

悲　犬[1]

我初入山，
犬狂吠门前；
我既入山，
犬摇尾乞怜：
大哉犬哉！
何前倨[2]而后谦[3]！

---

① 这首诗是从白坚武《惺菴日记》原稿中发现的。在白坚武民国八年八月十九日日记中，同《山中即景》一块抄有李大钊寄给白的这首诗。诗里所讲的“入山”，就是来到昌黎五峰山的韩昌黎祠。

② 倨：傲慢。

③ 谦：音廉，与诂通用，这里是方谄的意思。

岭上的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呵！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山　　峰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山中落雨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欢迎陈独秀出狱[①]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①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李大钊与陈独秀、高一涵等数人到城南游艺园分头散发传单，陈独秀被捕。同年九月出狱。十一月，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了这首诗。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①]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②]！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① 只眼：陈独秀的笔名。
② 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陈独秀于九月出狱时，《每周评论》已于八月三十一日被反动政府查封，所以诗中有“只眼”“复明”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的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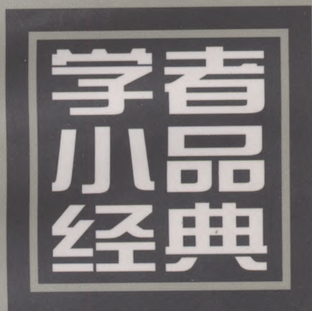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

ISBN 7-5405-1815-4



定价（全 8 册）：76.80 元



（第一辑）